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源

2025年·第1期·总期: 173 + S\$5.00



我的重要“角色”

顾芝绮的戏剧人生

- ◆ 艺术即救赎——画家Oscar
- ◆ 当文青遇上了愤青
- ◆ 青春不老 生命有价——长河专访
- ◆ 两地书 南洋情
- ◆ 新闻图景中的印尼糖王黄仲涵
- ◆ 走过一个半世纪的新加坡华校教科书



优秀文学作品奖2025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5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诗歌。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诗歌（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1200字左右（长诗或组诗不超过2000字）。

投稿：即日起至2025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杯及奖金S\$2000元。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 征稿要求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 投稿方式 —

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并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的中英文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发放稿费和邮寄杂志。

— 稿件录用 —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联络人：谭瑞荣 电话：6354 4078 电邮：ruihong@sfcca.sg



编辑语

文·谭瑞荣

“世界是一个舞台。男男女女都是演员，他们有下场的时候，也有上场的时候。人在其一生都扮演着好几个角色。”莎士比亚如是说。

“无论角色大小，我都全心全意地投入，从不轻视任何一个角色。作为华人，在新加坡能够借华语戏剧这个平台，来实现对华族文化的弘扬，我觉得这也是我的重要角色。”顾芝绮在“戏如人生”中这样诠释“角色”。

“在生活中，每个没经过彩排的对话、事物、遭遇都考验着人的临场反应能力，都是一种即兴。”这个来源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课程，被郭婉妤移植到北大校园。“从新出发”的文章，不就是教导学生即兴地发挥“角色”的作用吗？

“我想：饮食就和婚姻一样，两者都需要一个缓冲的适应期……这个过程，就像慢火熬老汤。”“炊烟岁月”里的文字，除了优美酣畅，其实更重要的是：作者尤今既能将人的“角色”塑造得血肉丰满，又能将人与物进行角色互换，从而隐喻出人生哲理。

“坡上人家”郭振羽的文字，其角色的代入感也极强：“事实上，朋友看到我们两个人，一个白发苍苍，一个明眸皓齿，感觉上明明是老夫少妻……当年我常到中国开会，人家以为是一位老教授带了个学生助理……或者是一位老院长带了一位小秘陪同”这段风趣幽默的文字，是不是瞬间就营造出了“角色”的鲜明形象？

再看“艺术长廊”文章对角色的演绎：流动小贩、食阁助手、留洋学生、大专讲师、暖心安娣、专业画家……您是否感受到了集勤劳、坚韧、善良、才学于一身的黄惠玲，其“角色”的蜕变？

而“文坛掠影”中长河的“角色”递进，又能让我们看到一个作家的成长：蒙昧幼童、优秀学生、文学青年、报刊编辑、出版社负责人、会长、诗人、作家……

所谓戏如人生。我们都在“即兴表演”；我们都在不断地选择“角色”；我们既是自己人生的主角，也是他人生活的配角。我们对“角色”的认知，似乎带入了“存在主义”的思考和悖论。但是，如果您一览本期的文章，您会发现：人们都在努力扮演好自己的人生角色，为自己和社会负责，并赋予角色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2025年·第1期·总期：173

■出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编辑顾问■

吴绍均

■编辑委员会■

主任：严孟达

委员：尹崇明 黄保华 锺天祥
陈嘉琳 叶舒瑜

■总编辑■

谭瑞荣

■副主编■

欧雅丽

■英文校对■

何秀菱

■总代理兼发行■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设计、分色、承印■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出版准证■

ISSN 2382-5898
MCI (P) 040/01/2025

■出版■

2025年2月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目录

- p 4 炊烟岁月 传承爱的味道 尤今
—— 趣谈家常粤菜和琼菜
- p 7 艺术长廊 艺术即救赎 赵宏
—— 画家Oscar
- 12 文坛掠影 青春不老 生命有价 齐亚蓉
—— 长河专访
- 当
今
16 戏如人生 我的重要“角色” 章秋燕
—— 顾芝绮的戏剧人生
- 人
文
20 南洋纵横 两地书 南洋情 潘梅
- p 24 文化传灯 传承年味 冯焕好
- p 26 吾乡吾厝 新闻图景中的印尼糖王黄仲涵 陈煜
- p 30 星洲回眸 “早操”在新加坡的故事 黄兰诗
- p 34 人力车走过的历史踪迹 陈伟玉





p.7 艺术长廊



p.12 文坛掠影



p.38 坡上人家

- p 38** 坡上人家 当文青遇上了愤青 郭振羽
- p 40** 旧貌新颜 森林与现代交汇：登加新镇蜕变的故事 李国樑
- p 45** 从新出发 从斯坦福到北大元培：探索即兴魅力的新世界 郭姍姍
- p 48** 社团聚焦 “新厦论坛”话闽南 胡雪琦
—— 记第二届“闽南文化在新加坡”
- p 50** 文化百科 走过一个半世纪的新加坡华校教科书 李金生
- p 54** 最爱书房 人生闯关：城市书房推出三位年轻作者的第一本书 庄永康
- p 56** 仿佛风 我的诗歌 杨雅琦
- p 56** 祈愿 邱民宗
- p 57** 一家人 李亨
- p 58** 本土文学 乡情似海 岁月如歌 沈芯蕊
- p 61** 总会专递 李显龙资政与华社共同喜庆乙巳蛇年 苏琳莉
—— 宗乡总会与华族文化中心联办2025年新春团拜
- p 63** 春到河畔2025 叶婷
—— 鞭炮声声贺新岁 祥蛇喜迎SG60

趣谈家常粤菜和琼菜 传承爱的味道



文·尤今

初婚那一年，日胜带我回返怡保省亲。正是端午节，大家在圆桌坐定之后，婆母便端出了热气腾腾的粽子。

婆母的粽子以形状独特而馅料丰富在亲友邻里间遐迩闻名。一般的粽子是三角形的，然而，她包裹的粽子却是饱满的椭圆形的，我心里偷偷地想：“噯，真像古代的三寸金莲啊！”（嘿嘿，这样的联想，委实有点儿煞风景）。粽子里丰盛的馅料包括：肥瘦掺半的猪肉、冬菇、栗子、虾米、鱿鱼丝、咸鸭蛋黄和干贝丝。裹好的粽子放入方形的大油桶里，用薪柴连续不断地蒸煮九个小时。煮好的粽子，

兼具外在美与内在美，有口皆碑。

此刻，这个丰满得近乎性感的粽子，就摆在眼前，异香扑鼻。大家都摩拳擦掌，急欲大快朵颐。我看到桌子上有一罐白糖，便依循多年以来吃粽子的习惯，先后舀了两大匙白糖，撒在粽子上。看到我这个举动，周遭原本叽里呱啦的谈话声，突然划上了一个休止符，宛如电影一个突兀的凝镜。我的姻亲，全都愕然地看着我。首先“发难”的，是性子诙谐而又惯于和我抬扛的小叔日砰，他表情夸张地说：“嘿嘿嘿，用白糖配搭肉粽？请问你是外太空来的吗？太阳底下，果然日日都有新鲜事啊！”温婉的大姑，怕

我尴尬，赶紧解释道：“这是咸味粽子呢，一般是上是不配搭白糖一起吃的。”

我茫然地看着他们，心里强烈地感受到不同饮食习惯所带来的冲击。

母亲的舌头，像是用冰糖铸成的，一碰到甜食，如逢故交，你依我依，欢欣雀跃。喝茶、饮咖啡，每一杯总加入四五茶匙糖。别人看到，常惊讶地问道：“你是在喝糖水吗？”说起糖水，母亲隔三岔五便会煮一大锅糖水（也称甜汤），犒赏自己一日的辛劳。白果腐竹薏米糖水、红豆沙、马蹄绿豆沙、木瓜雪耳糖水、花生眉豆糖水、冬瓜红枣糖水等等，轮番着煮，花样特多。不管怎么疲累，一大碗糖水喝下肚，整个人就熠熠发亮，眉眼鼻唇都是笑。

她常说：咸味带涩、酸味尖利，唯有甜味，面面俱圆，任何食物糅和了甜味，便能显出温柔敦厚的一面。因此，每回在吃咸粽之前，她总会在上面撒上两大匙白糖。我自小耳濡目染，早就习以为常了。

没有想到，这样的吃法，在婆家居然掀起了海啸般的反应，他们都认为用排山倒海的甜味覆盖食物的鲜香，是“暴殄天物”的做法。

我从善如流，把白糖撇开，专注地品尝婆母的咸味粽子；起初，味蕾习惯性地去寻找甜咸交汇的那股熟悉的味道，寻不着时，还颇为失落哪！然而，渐渐地，居然也品出了截然不同的风味。那种百味麇集的鲜香，的确不同凡响。我必须坦白地承认，加入侵入性强的白糖，确实淹没了粽子无与伦比的好滋味，是一种不当的“蹂躏”。

许多时候，食物就和婚姻一样，当你为对方做出妥协之后，表面上看起来吃亏了，实际上，你却能从不同的角度让藏在心中的那个小我受惠成长。

傍晚，我在厨房看婆母烹制她最拿手的海南白斩鸡，又再一次感受到不同饮食习惯的冲击。

她在锅中加入姜片、班兰叶、青葱和少许盐，煮开。将鸡放入沸水中氽烫10秒，捞出，同样的动作重复三次。之后，将水重新烧开，把鸡放入锅里，用小火煮15分钟，再焖10分钟。之后，用筷子插入鸡腿，发现没有血水流出，便快手将鸡取出，放入加了两大匙米酒的冰水中，把碎冰叠在鸡只上面，浸泡10分钟。

“干吗让鸡只好像发疟疾般又热又冷地饱受

折磨？”我忍不住戏谑地问在厨房当副手的大姑，她还没有回答，婆母便笑着解释：“趁热用冷水浸泡，鸡皮可以迅速收紧，吃起来富于弹性，同时，也可以保持鸡肉的柔嫩多汁。”

婆母将鸡只从冷水中取出，沥干水分，轻轻敷上一层麻油，便大功告成了。

正惊叹简易如斯，没有想到好戏在后头——鸡饭和酱料的准备功夫叠床架屋，惊人地繁琐。

将成块的鸡油脂熬成金黄灿亮的鸡油，在油里爆香蒜末和葱末，再将浸泡过水的米放入锅里炒香，注入鸡汤，炊煮成饭。香气在黄澄澄的饱满米饭中蜿蜒行走，真能夺人魂魄啊！

接着，婆母准备酱料——将春碎的辣椒、蒜末和葱末糅合，再挤入柠檬汁、加入糖和鱼露、调入鸡油，内容丰富的辣酱始大功告成。此外，还得把姜春碎，加入蒜油和一丁点儿盐，做成另一碟蘸料。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浓稠的黑酱油，婆母用的是被誉为“味道魔法师”的兰花牌特级黑酱油。这是怡保道地的产品，质感厚实，味道细致，微带鲜甜，有着黄豆迷人的香气。

诞生于海南岛文昌市的婆母，常常自诩她烹煮的白斩鸡是最为地道的。海南菜风味较为清淡，惯于用简单的调味凸显食材的自然原味，而白斩鸡便是海南菜肴中的佼佼者。

那时，我很年轻，对海南白斩鸡这种保持原味的菜肴不感兴趣。虽然新加坡处处都有海南鸡饭的摊子，然而，我从不光顾，我嫌那清水白煮的鸡肉味道寡淡；更糟的是，对于婆母花了大功夫准备的酱料，我也不懂得欣赏。

对着婆母端上桌那一盘木无表情的白斩鸡，我心里深切想念着的却是父亲的酱油卤鸡。

祖籍广东的父亲，是不折不扣的饕餮，爱吃，也爱下厨。能变百味的鸡肉，更层出不穷地在我家餐桌上绽放光芒。

广东菜在调味上讲究“和谐”，即以多样化的调味料和食材达致天衣无缝的融合，借此诱发食材深层的好味道，并以此丰富菜品参差的层次感。以父亲的卤鸡来说，便动用了蚝油、花雕酒、白糖、盐、陈皮、丁香、八角、桂皮、姜、葱、蒜等等调味料。卤好的鸡啊，风情万种。浓郁的卤汁透过了光滑紧致的鸡皮，淋漓尽致地、彻彻底底地渗入了嫩滑的鸡肉中，味道饱满，香气流溢。桌上有了这道卤鸡，我能够囫囵吞枣地

吃上三大碗白米饭。至于那淡若无味的白斩鸡，又如何与同样寡味的白米饭激起爱的火花呢？我想不明白呀！

婚后，年年随同日胜回返怡保过年。每一年，白斩鸡总傲然盘踞于花团锦簇的丰盛菜肴中。吃、吃、吃，原本像岩石般顽固的口味，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熏陶中，终于有了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慢慢地，我从不事修饰的鸡肉当中，品尝出了一种出水芙蓉般的甜味，这种甜味，若隐若现，当你揪着了它以后，它就变得立体而又清晰，原本蕴藉不露的香气，也一波一波持续不断地涌现，源源地在味蕾上缭绕交缠。后来、再后来，再再再后来，白斩鸡这菜肴，就成了我心头大爱之一。这个变化的过程，犹如墨汁晕染宣纸，是循序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熬煮汤水这一码事上，母亲与婆母的信念和做法也是大相径庭的。

对于广东人来说，煲汤，不单是日常饮食那么简单而已，它还是代代相传的一种养生文化。

母亲煲汤，讲究荤素相配：瘦肉、排骨、鸡肉、鱼肉、鸭肉、墨鱼，轮流配搭各类瓜果蔬菜，如玉米、莲藕、老黄瓜、胡萝卜、冬瓜、鱼翅瓜等等。或者，配搭各类药材，诸如：党参、淮山、枸杞、红枣、当归、人参、茯苓、桂圆、玉竹、黄芪等等。食材配搭不一，滋味迥然而异，百喝不厌。至于以药材当汤品的食材，主要是借以滋补和调理身子，一石二鸟。

母亲通常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开始熬汤，狠狠狠狠地熬煮或炖煮几个小时，到了傍晚时分，当就读下午班的我们回返家门时，远远地，便闻到了一缕缕韵味悠长的香气，从香气里揣测汤品的内容，是我少年时期百玩不厌的游戏。在汤的香气里，蕴藏着比海还要阔、比井还要深的亲情，那就是家的味道。它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抚平生活带来的所有不安、焦虑、紧张和林林总总的压力；即连灰沉的暮色，也被镶上一层金光。母亲熬煮的汤，底蕴深厚，内涵丰盈，气象万千，当那甘醇润泽的汤水由喉间汨汨流入时，原本骚动浮躁的五脏六腑霎时变得柔和平顺，天和地，也在电光石火间变得寂然无声。在我长长的一生里，只要闻到汤的味道，不论我置身于天涯或海角，心底总会泛出一股极其温柔的感觉。曾有人以“汤是液态的亲情、流质的幸福”来形容这种感觉，真是“镶金镀银”的绝妙

好句啊！

婆母也煮汤，我在这里用“煮”这个字眼而没有用“熬”，是因为汤在婆家并不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仅仅只是餐桌上的陪衬品。婆母煮汤的食材，有时会让我大吃一惊，比方说，有一回，她把原本清甜爽脆的黄瓜放进汤里，煮得糜烂糜烂的，我简直就看傻了眼——在我家里，黄瓜永远只能用来腌制或生食；再说呀，以黄瓜和虾米当汤品的食材，我认为实在简陋得不可思议。婆母常煮的另一道汤是木瓜花生排骨汤，我在心里嘀咕道：“木瓜明明是水果嘛，怎么竟会跑进汤里头！”不适应啊不适应。还有一道我不喜欢的，是苦瓜瘦肉汤。爸爸焖煮的苦瓜豆豉排骨，好吃得让舌头也融化了，可是，在婆家，苦瓜居然迷路了，狼狈不堪地跌进汤水里面，被煮得绵绵软软的，全然失去了原有那种“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铮铮风骨，真可说是“英雄落难”啊！椰子鸡汤也是我不能忍受的，我觉得宛如甘露般的椰子水活生生地被“改造”成了一种很陌生的液体，三不像啊！

然而，奇怪的是，旷日持久，我竟然也发现，黄瓜汤清淡爽口、木瓜汤甘醇鲜美、苦瓜汤微苦回甘、椰子汤清甜滋润，各有千秋，别有惹人怜爱处。它们简单易煮，适合节奏快速的现代生活。工疲归家，如果不想外出沾惹那些油腻腻的食物，快手快脚地煮一锅汤，烟气袅袅地一大碗捧在手里喝下去，幸福得眼泛泪光。

我想，饮食就和婚姻一样，两者都需要一个缓冲的适应期。我们不能期望在截然不同环境下成长的两个人一旦缔结连理，便能立马全盘接受对方累积多年的口味。这个过程，就像慢火熬老汤。起初，食材放进水里，食材是食材、水是水，两不相干；然而，时间久了，食材和水，便两相交融，不分你我了。

喜欢粤菜的我和偏爱海南菜的日胜，在结婚之后，从不强行同化对方。然而，在潜移默化中，双方不断地异中求同，摸索、尝试、接纳。终于，渐渐、渐渐地，爱上了对方熟悉的口味。然后，在交错重叠的香气里，共同创造出糅合了粤菜和海南菜风味的、独属于我俩的食谱，传承给下一代。

家的味道，也就是爱的味道。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艺术即救赎

画家Oscar



文图 · 赵宏

对 很多人来说，生活里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父母爱抚的目光、明媚的天空下绽着笑脸、散着香气的花儿、甚至是一小口甜甜的冰激凌的味道……但也有些人，似乎总是被噩运与痛苦包围着。呼唤“悲剧的诞生”的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曾说过：活着是如此痛苦，人生是如此惨淡，我们何以承受？^[1]怎么办？尼采同样也说过，艺术救赎了他们，透过艺术，他们重新获得了生命的意义。^[2]

自小多坎坷

尼采提出的是沉重的哲学问题，但画家黄惠玲（Oscar Ng, 1971-）遇到的却是真实的人生问题。一个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更没有做坏事，得到的却是无比悲惨的结果，这大概就是悲剧。悲剧排除了人为的偶然性，也异于善恶因果的规律，所以悲剧的本质就是命运。命运大概是给Oscar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她的家庭是任何小孩子都不愿意接受的。父母是嗜赌之人，从小对她疏于关心和照顾。在上学的年纪，她已经开始打工，无论是建筑工地、流动小贩、还是忙碌的食阁，都出现过那瘦弱、细小的身影。然而，异于常人的母亲还是不会轻易放过她，以至于她在英保良集团（Emporium Holdings Group）勤工俭学时，母亲常常于发薪之日提前赶到公司人事部代领她的薪水，不答应就大吵大闹，不给她留下一分钱。为了保住那一点点辛苦钱以维系正常、体面地继续读书，Oscar



后来不得已央求经理谎称她欠同事借款，这样才能勉强截留一部分钱款。

“幸亏有艺术。画画是很幸福的事，可以让我逃离家庭”，Oscar如是说。

这世间终究是有大爱的。Oscar于1990年入读南洋艺术学院，先是修读设计专业，后改为纯美术专业，半年后停学打工，复于1991年至1993年续读。毕业后她在曾经

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与菲利普亲王的本地知名茶室——茶渊打工。茶渊创办人兼主席李秉蓁偶然得知Oscar努力工作是为了筹措学费到国外读书深造，决定出手帮忙，主动提出要为她作银行担保。办好手续后，他请Oscar吃鸭面。“那我如何报答呢？我回来后为您打工三年吧？”善良的Oscar明白感恩的道理。“不用，等你有了能力，就像我一样，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李秉蓁头也不抬地回答。在那一刻，这一句简单的回答就是世界上最动人的语言。这次经历让Oscar从此确立了一生都秉持的信念：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是人性的救赎，在痛苦和磨难面前，善良的人性可以治愈一切。

通过打工赚学费，加之李秉蓁的资助，以及国家艺术理事会颁予的奖学金，Oscar于1995年至1996年赴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修读艺术批评与工作室创作专业。在樟宜机场的出发大厅，她孤身一人，没有人送行，也没有含着眼泪的嘱托和不舍的拥抱，那些温情脉脉的时刻从来就不属于这个过早地喝下生活苦水的小女生。在机场的另一端，也有一群人，热闹地围着一个英俊的青年——画家巫思远（Boo Sze Yang, 1965-），他碰巧也是搭同一班飞机去英国读书。“思远看到落寞的我，很担心，在飞机上好几次特意走过来问我，你还Okay吗？”Oscar回忆此景时，眼泪婆娑。



《麻坡后巷》布面油画 80X100cm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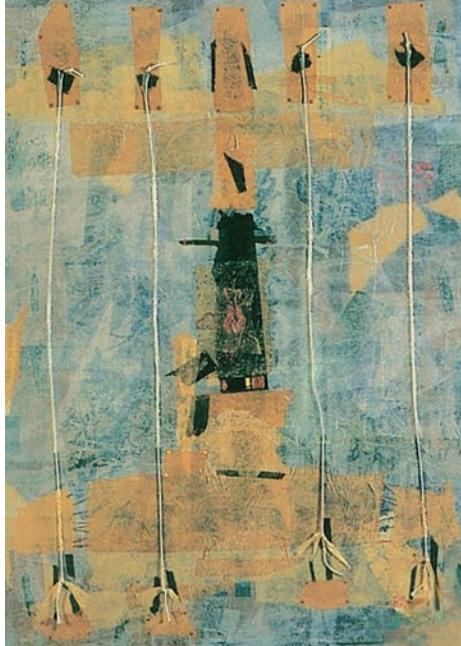
源自文化意识的觉醒

在伦敦读书的日子辛苦却充实。穷学生最开心的时光就是：跑到海鲜市场买当地人吃不到的鱼头。鱼头很大，要价却非常便宜，花费不到1英镑，几十便士就能买下原本是专门喂猫的食物。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Oscar来说，这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放上一大包从新加坡带来的咖喱粉，一锅香喷喷的家乡美食就煮好上桌了，足以慰藉孤单的内心。课堂上，针对作品的各种分析和讨论是激烈而有挑战性的，下课之后，Oscar也没有松懈自己的艺术创作。在这一时期，她创作了极其重要的以中国书法线条为基本概念的线性图像作品，比本地国宝级画家林子平（Lim Tze Peng, 1921-2025）在2005年左右推出的“树字”或“糊涂字”早10年，比中国书法界神仙级别的人物、林散之（1898-1989）大师弟子王冬龄（1945-）在2013年前后推出的“乱书”早了近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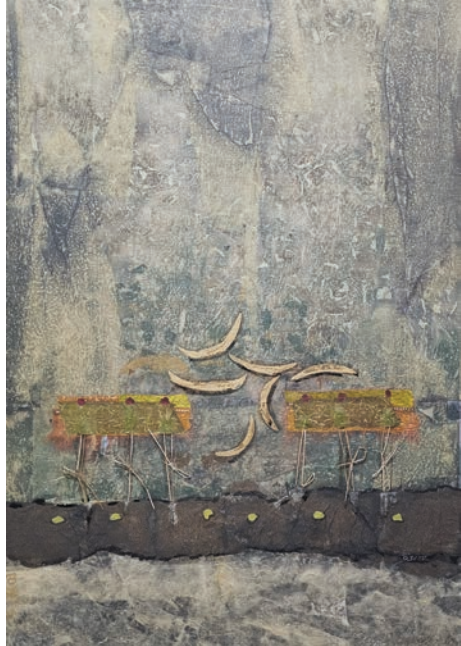
比较而言，林子平的“糊涂字”实现了一项风格的突破，“这种新风格强调笔触的表现力和优雅，而不是从书写中得出的语义。近年来，他进一步突破了界限，在糊涂字中使用了强烈、明亮的色彩，颠覆了中国书法的百年传统。”^[3]而深耕中国文化精髓的王冬龄则“在‘乱书’过程中，将书写者的状态放在首位。他强化了每笔、每字、每行的势态，夸张字间的大小和干湿浓淡变化，并一反‘识读’的需要，故意将字字行行套嵌在一起，形成一种虬曲盘结、苍茫混沌



《言中意》混合媒体 60X60cm (2024)



《东方情愫》混合媒体 130X97cm (2024)



《情绪》混合媒体 120X90cm (2024)

的效果，这确实是古代书家不曾有过的，让人不禁想到黄宾虹（1865-1955）的画。黄宾虹的画从乱中求趣，层层叠叠，相破相立，近视如若无物，远观则‘浑厚华滋’。黄宾虹笔下的物象从局部看都‘歪歪扭扭’，但整体上却相互平衡、恰到好处。他特别善于使用‘破墨’和‘积墨’的方法，也就是让浓淡干湿、长短正侧，性状各不相同的笔墨相互叠加，形成既深厚又通透的效果。反观王冬龄的‘乱书’，其间架结构左右掩映、大开大合，与黄宾虹乱中求趣的旨趣无二。”^[4]

与林子平和王冬龄不同的是，Oscar系英校生出身，这件突破传统的当代水墨抽象作品虽然不是基于对中国书画的生命——线条的理性再认识和有意识的颠覆，却是出于真实的情感表达，是新加坡华人艺术家对自身文化定位的一种回归式觉醒。在纯粹的西方文化氛围里，原本在新加坡并不明显的文化属性变得异常突出，我是谁？我的文化是什么？什么才是我的艺术的精神根源？这样的问题，也曾同样刺激着同时期与Oscar有一样经历的巫思远。作为一名艺术家，用艺术来排解孤单和痛苦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别人的艺术是别人的，而有文化归属的艺术才是自我的。在悲苦的时候，Oscar没有选择用油彩在画布上涂抹，相反，从小受英文教育的她却提起了毛笔，铺开宣纸，完成对自己的精神救赎。当外国同学有些夸张地对作品说真漂亮、真棒的时候，Oscar却冷静地说，不是这样，我创

作的时候很伤心，很难过。

把爱回馈给母校和学子

学成归来，Oscar即返回南洋艺术学院教书代课。那个时期，在南艺教书的美术专业老师大都脱不开行政事务，比如催收学费、安排学生活动等各种琐事，老师们深厌其烦，几乎都不愿意参与。目睹此景，热心的Oscar决定退出教学职位，改成全职行政人员——她要去帮助大家，承担并改变这些看起来麻烦、耗时而又没有成就感的工作。比如代请专业课老师、安排短期课程、课前准备服务、组织文化营等等。

有一次，她请大名鼎鼎的水彩画家王金成来上水彩示范课。王金成告诉她要画螃蟹，于是Oscar就去巴刹买了几只不大的螃蟹，毕竟经费有限。孰料上课前王金成一看，就阴下脸问，这怎么画？我要熟的，红红的那种。Oscar从没煮过螃蟹，只好忙不迭地去烧水，把螃蟹放进去煮，结果拎起来的时候，好几条腿都掉了。怎们办？“只好用牙签再一条一条接起来喽。”那一堂课，王金成现场写生示范，完成一幅生动的水彩静物作品，学生们则获得一次难得的观摩大师创作的体验。

南艺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文化背景各异，年龄和生活习惯也大相径庭。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们，Oscar申请在校园里设置了临时病房，为生理期不方便的女生提供休息场所，同时开设心理干预辅导，抚平青年人躁动不安的



《台湾深坑老街》纸上水墨 23X30.5cm (2024)

情绪。曾有一个年龄偏大的外国学生，出身贵族家庭，在课堂上的作品表述和点评环节，突然情绪失控，竟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将电脑摔在地上，夺门而出。事后Oscar找他谈心，让他打开心结，不再纠结于是否会被同学和老师看不起。Oscar曾经在很小年纪的时候没有得到过爱，现在，她要用最温柔的笑容，回馈给年轻的学子，完成对年轻灵魂的救赎。于是她有了一个江湖封号：安娣Oscar，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她的华文名字叫黄惠玲。

用艺术表达人生

然而，艺术家终究还是要靠作品说话。1992年，Oscar在南艺读书期间有两件作品获得当届UOB年度绘画大赛最佳表扬奖（Highly Commended Award），1994年复以作品《东方情愫》（In Relevance of the Oriental）再度获得UOB大赛公开组荣誉奖（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Award）。1997年从英国毕业回来，Oscar获得第19届壳牌石油公司赞助的艺术新人奖。2024年，Oscar逐步从南艺的行政事务回归绘画，参加东盟文化艺术创作季（第五季）国际交流展，以作品《言中意》在200余件参选作品中胜出，斩获白鹭奖。

Oscar早年多创作油画，近年以速写及水彩为主，偶尔也有水墨作品。她的硬笔速写作品，无论是设色敷彩，还是纯粹的以白描线条入画，都显示出扎实的观察能力和造型能力，十分精彩。

在2024年创作的题为《居銮早市集》（Kluang Morning Market）白描作品上，Oscar描绘了一处马来西亚小镇流动小贩售卖的场景。近景偏左的地方，是一位卖菜小贩和两位顾客，远景中是另一位正在煮炒的小贩。画面中的人物略微变形扩张，增加体积感和情绪表达，流露出创作者的自信与熟练。画面中的细节非常丰富，无论是小贩所用的器具，还是人物的服饰或神态，乃至背景中树木叶子的走向，都是准确且洗练的，既可

以看出笔触运动的速度，也可以感受画家的情感变化，平稳舒缓，张弛有度，似乎可以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写生并非象照相机一样原封不动地记录画家眼前的场景，环境是静止的，但人物是动态的，画家必须能够在精准观察的基础上迅速提炼、创作，进而完成作品，这对技法等多项基本功的要求很高。

在另一件题为《古来夜街》（Kulai Night Scene）的炭笔画作品上，Oscar娴熟的美术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也得到很好地体现。画面中传统的两层店屋房脊向上耸起，转角处的路灯已经点亮，钛白粉勾勒出的光晕大胆、直接，却不违和，右侧细长的几个铁杆上，电线以浅浅的弧形连缀着。两辆小轿车的位置是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大小和体积区别明显，暗示出画面的透视和景深关系。整幅画面，以炭笔勾勒和适当涂抹，个别地方用钛白强调出光感，画面极富叙事性，有一种不言自明的神秘以及静谧与安详，怀古气息浓厚。即使是作为背景的天空，画家也是用精炼的笔触和恰到好处地晕图，将远方的天光和远景中的光线带入进来，完美地呈现了气氛的配合。

还有一件非常情绪化的小品，右侧题记写的是“草屯平林國小旁小路有美丽的牵牛花”，描绘的应该是台湾某地一间小学校旁的一处角落。事实上，作为绘画主题的蓝色牵牛花，只是画面右侧不起眼角落里的几个星星点点而已，这是非常有趣的点明画题的方法。以往有不少油画名家

Artist Oscar Ng, Auntie Oscar

的名作都是以这种环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命题，显露一种举重若轻的艺术感。画面中间醒目位置是两根以非常放松的笔触画出的斜向的电线杆，校舍旁低矮告示牌的铁脚也是一笔完成，歪歪扭扭，非常随意。一丛小小的牵牛花，卑微而平凡，这就是画家最柔软的内心，既不娇艳，也不张扬，安静、执着。

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说：“艺术中最美的总是属于心灵的，是为感官应运而生的：一件艺术作品被艺术家制作出来，却是在观赏者的想象力中诞生的。”^[5] Oscar在生活中曾经经历苦难，但艺术救赎了她：让她得到贵人的帮助，进修学业；让她逃离不堪的境地，安慰她孤单寂寞的心灵；也让她学会爱与付出，以信仰一般的虔诚，把曾经眷顾她的善良与温情再次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痛苦、挣扎或者仇恨，感受到的尽是平和、放松以及内敛的爱与坚忍的激情。

注释：

- [1] 孙周兴，《尼采〈悲剧的诞生〉译后记》，《尼采著作全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23年。
- [2] 独视角，《哲学与艺术的共通性：“自我”、“世界”与“超越界”》，百度百科，2019年8月30日。
- [3] artcommune，新加坡集菁艺社网站，<https://www.artcommune.com.sg/artist-lim-tze-peng>，2024。
- [4] 陈思渊，《王冬龄的“乱书”和黄宾虹》，<https://www.inkstudio.com.cn>，发表时间不详。
- [5] 叔本华，《叔本华论生存与痛苦》，译者：齐格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Fate has probably played a huge joke on Oscar. Her family is one that no child would want to be a part of. Her parents are problem gamblers and neglected in taking care of her since she was a child. While she was still in school, she had already started working to make a living, whether at a construction site, as a street vendor or in a busy food court; one could easily see her there. Fortunately, upon graduation from NAFA, Oscar found a job at the famous Tea Chapter which once hosted Queen Elizabeth II and Prince Phillip. The tea house was founded by Mr Lee Peng Shu. After he heard about how hard Oscar was working to save up for her overseas studies, he decided to support her and act as her guarantor.

Oscar once created a series of linear image works based on the basic concep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strokes during her stay in the UK. This was 10 years earlier than the “Shuzi”, the “Tree Characters” or “Hutuzi”, the muddled calligraphy introduced by local art master, Lim Tze Peng (1921-2025) around 2005, and nearly 20 years ahead of the “Luanshu” literally known as chaotic calligraphy, created around 2013 by Wang Dongling (1945-), a master of art and a disciple of Lin Sanzhi (1898-1989), an important figure in China’s contemporary calligraphy circle. In comparison, Lim Tze Peng’s “Hutuzi” achieved a breakthrough in the sty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while Wang Dongling, who has deeply explored the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prioritise the state of the writer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He strengthened the momentum of each stroke, each character and each line, exaggerated the size, wetness and shades of the characters on the rice paper, and reversed the need for reading by nesting the rows of words together.

In 1992, two of Oscar’s artworks won the Highly Commended Award in the UOB Painting of the Year competition while studying at NAFA. In 1994, she won the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Award in the Open Section of the UOB competition again with her artwork “In Relevance of the Oriental”. Upon returning from the UK, she won the Most Promising Artist from the Shell Discovery Art Awards.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the German philosopher once said that the most beautiful in art always belongs to the soul and is born for the senses: a work of art is made by the artist, but it is born i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viewer. Oscar had experienced hardships in life, but art saved her, enabling her to seek help from people who are supportive in further her studies; art freed her from the unbearable real-life situation, comforted her loneliness; and taught her to love and to give as well, sincerely to pass on the kindness and warmth that once favoured her to those in need. We do not see pain, struggle or hatred in her works but peace, relaxation, restrained love and stoic passion.

Students in NAFA come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ges, and living habits. In order to take better care of them, Oscar set up a sick bay in the campus to provide a resting place for girls who were unwell during their menstrual period and offered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services to soothe the restlessness of the youth. Oscar did not receive love at a very young age, but now she gives her students the gentlest smile and completely cares for them, earning her the nickname Auntie Oscar, to the extent that not many people realise that her Chinese name is 黄惠玲。

青春不老 生命有价

长河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槟城记忆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祖籍海南文昌昌洒镇抱才村的陈业植南来新加坡“打洋工”（在洋人家做事）。其妻随后南来，他们夫妻二人包揽了洋雇主家所有的家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三四年，他们跟随洋雇主来到马来亚西北侧的槟城。雇主夫妻住在一栋小洋楼里，洋楼延伸出去的平房是业植夫妻的栖身之所。两三年之后，他们的长子、长女先后出世。

1941年12月18日，他们的次子出世。读过几年私塾的业植为这个排行老三的孩子取名川波。

川波有关人生的最早记忆始于槟城，但他日后能够准确忆起的也就两件事。

其一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次年（1946年），也就是他四岁多的时候。那年年初，应邀赴伦敦参加英联邦反法西斯胜利大游行归来的堂兄邓福隆（本名陈忠洲）坐着卫兵驾驶的吉普车，带着堂嫂来槟城探望他们一家。这是川波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时任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森美兰第二独立队司令员的堂兄（50年代中期，堂兄在抗英武装斗争中牺牲）。

其二发生在他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哥哥带他去看人家踢足球，途中他不小心跌进河里弄湿了衣裤。回家后，哥哥因没照顾好弟弟而被父亲用藤条打屁股。明明是自己的错，挨打的却是哥哥，这令他十分不解，耿耿于怀。

那时的川波除了哥哥跟姐姐，并无其他玩伴。记忆中的他曾入读距离住家不远的培青学校一年，但具体情形已忘得一干二净。

文学启蒙

1948年杪，川波一家随洋雇主夫妻回到了新加坡，他们跟着雇主夫妻住在赛马场附近。

次年，川波踏入邻近华侨中学的乡村小学——联华学校，就读二年级。

三年后，川波的父亲离开洋雇主另谋生路。他跟亲友在巴耶里峇合开了一家咖啡店，由他负责经营。他们一家人租住附近的亚答屋，川波转读不远处的侨南学校。



长河及其部分作品



年轻时的长河

转入侨南学校之后，川波似乎一下子开了窍，他的总成绩稳居全班第一。教他华文的梁关飞老师毕业于中正中学，他

不时会补充讲解一些课外读物给学生，启发他们求知并践行。梁老师后来获全马琼联会奖学金进入南洋大学深造，为南洋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首届毕业生。

小学毕业后，川波就近入读琼州会馆主办的育英中学。由于学业成绩优异（全班第一），他被老师推选为校图书管理员。这让他有条件接触到许多课外书，他的学费也获减免。

这一时期，川波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三年级时，他的处女短诗《傍晚路上》发表于《南洋商报》的《学生园地》版。

1957年，川波升入高中。由于成绩突出，他获海南琼崖陈氏公会颁发的奖学金。

高中时他曾有一次校际作文（议论文）比赛中斩获第一。高三那年，他有一首有关同窗之谊的短诗发表于《南洋商报》的《学生园地》版。另外，他的短篇小说《落网》刊载于当年的高中毕业特刊。

1959年，川波在高中毕业会考中获取5个A的佳绩，名列全校之首。

次年，他获全马琼联会颁发的奖学金进入南洋大学中文系深造。

结缘方修

进入南洋大学的川波开始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中外现代诗人的作品。中国诗人艾青、臧克家、何其芳、郭沫若及西方诗人普希金、惠特曼、哥德、莎士比亚、拜伦等的诗集都令他爱不释手。他还跟喜爱诗歌创作的同窗李大倍（笔名李贩鱼）成为好友。李大倍借了一些中国新诗集给他，还给他看自己手抄的一本中国新民歌，川波也给自己抄

了一本。

大二那年（1961年），川波以山河为笔名，参加了中文学会主办的全校创作比赛。他的长篇叙事诗《捐躯》获诗歌组第二名，该获奖作品刊载于《大学青年》第五期。

大三那年，他分别以山河及风禾为笔名，参加了校学生会主办的“大学周文艺创作比赛”。他的组诗《无名河，哼哀歌》获诗歌组第一名（笔名山河）；他的短篇小说《椰林之夜》获小说组入围奖（笔名风禾）。上述两篇获奖作品均刊载于《大学青年》第八期。

此次文艺创作比赛的评委包括当时著名的报人作家杨守默（杏影）、刘世朝（刘思）、吴之光（方修）及李星可，他们对获奖作品的评语也刊载于《大学青年》第八期。

时任《星洲日报》南洋新闻版主编的方修对此次获奖的诗歌作品尤为赞赏，他认为其中至少有三篇作品“可以代表目前马华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这段评语对川波的影响很大，坚定了他对华文文学矢志不移的信念与追求。以此为契机，川波跟这位享誉新马华文文坛的先驱作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学期间，川波曾任南洋大学中文学会秘书，他也是该学会出版的文艺刊物《大学青年》的编委会成员。

除了山河、风禾，长河也是他这一时期所使用的笔名之一，后来更成为他的固定笔名。

1961年，他还同李大倍参与校外文艺团体——康乐音乐研究会文学组的活动，与当时活跃于文坛并在康乐负责一些工作的史阳（韩弓）、雷宇（黎声）等结识，也邀约他们为《大学青年》供稿。同时，他也与康乐的戏剧、音乐、舞蹈组的成员成为了友人。

1963年，长河自南洋大学毕业。



1964年12月31日，长河与方修在方修家合影

编辑报刊

受时局的影响，以优异成绩获文学学士学位的长河并未能如愿觅得一份能发挥自己所长的工作。他教过补习，也参与工会的活动（先后在书报业工友联合会、缝业工友联合会的文化班担任老师）。他还做过大众百货公司的总经理助理。

但他并未放弃文学创作，并积极参与各类文学活动。1966年前后，他曾负责社会主义阵线政党机关报——《阵线报》文艺副刊《旗》的编辑工作。

1967年10月，他的首部诗集《无名河，哼哀歌》集结出版。因反响不俗，1971年2月再版。

1968年10月，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入职太平船务公司。半年后，方修推荐他应征《星洲日报》编辑。经总编辑黄思的测试，他于1969年4月被聘为《星洲日报》副刊编辑，负责编辑《东南亚新闻》《青年园地》《少年园地》及《儿童园地》等，后来还负责编辑《青年知识》版。

1970年及1971年，他受方修委托撰写的文艺界年度总结发表于《星洲日报》年刊。

这一时期，他还注册了一个出版社——天桥文化出版社。1970年5月，他出版了自己的文集《事在人为》。次年6月，他出版了自己的又一部文集《木石集》。李贩鱼的一部诗集及韩山元的一部文集也经由天桥文化出版社出版。

此外，他还注册创办了一份综合性月刊——《建设》，于1968年12月发刊。该月刊颇受读者欢迎，销量一度高达每期7000本。负责编辑出版的



1994年9月，游黄山时长河与夫人周秀乌合影

同时，他也为该刊写稿，常用笔名南海客。

1971年11月，因准证不获更新，刊行26期的《建设》月刊被迫停刊。

1972年5月，长河离开报馆重回船务公司。三年后，他的第四部文集《主观与客观的问题》出版。

1978年，他跟小他四岁的周秀乌结为夫妻。秀乌曾是缝业工会的活跃分子，也是他的学生。婚后的秀乌成为他生活上的得力助手。

1980年代，长河任职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至2003年退休。

虽然转换了跑道，但他对华文文学的信念与追求从未因此而淡薄。1991年3月，他的第二部诗集《掠过夜空的彗星》出版。

1991年年中，长河从主持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的雨石（谢声远）手里接过《艺术天地》的出版及编务工作。1992年1月，新版《艺术天地》刊印发行。因内容及篇幅皆增加甚多（原本内容多有关美术），故称“增刊”。第二期开始，改称《艺术天地 文艺增刊》。至第四期，他索性去掉“文艺增刊”四字，改回原称《艺术天地》。此后的30年里，这份综合性艺术杂志在本地文艺百花园中吐露着自己独有的芬芳。长河自己的创作亦未曾有过中断的时候。2005年4月，他把自己近年来发表于报刊的有关文艺评论的文章集结成书，是为他的评论集《文坛刍议》。

2012年8月，他的又一部综合性文集《文艺与人生》出版。

2022年12月，耄耋之年的长河卸下编务，出版发行了43期的《艺术天地》淡出本地文坛。

本世纪初，他还参与康乐音乐研究会（1964-1970）的会史编写工作，由他执笔完成该会16年的艺术实践记述——《历史的跫音》，于2011年编成出版。

参与文学组织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每月首个星期六下午，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友即雅聚于新马文史大家方修位于马里士他路的寓所。大家谈文论艺，互通信息，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愉快的周末。

方修担心文苑寂寞，希望文友们笔耕不辍，于是倡议筹组一个新的文艺团体，取名“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简称“热带”）。

1997年4月，“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获准注

册。李庆年、李过、风沙雁、流军、适民、彭竹生、周亚山、连奇、陈妙华、郑文彬、林祥雄被推举为首届理事，李庆年任会长，方修与刘抗任顾问。俱乐部开会讨论工作时，长河、柳舜、黄良发、网雷等也有出席。

“热带”创会宗旨有三：其一是联络会员，促进彼此间的文学交流；其二是弘扬与促进本地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其三是加强与世界各国文学艺术团体或个人的交往，通过切磋与观摩，促进彼此间的了解。

“热带”创立的前两年（1997-1998）尚未正式开展活动，但理事与会员曾多次聚谈，明确了俱乐部的两大任务：其一是举办文学艺术活动，包括座谈会、讲座、作品评析会、作品首发会、展览会（美术、书法、摄影）等；其二是展开编辑出版工作，包括《热带学报》（创刊于1999年1月，早期为年刊，后改为半年刊）与“热带文学艺术”丛书。

1999年，长河被推选为第二任会长，此后的他一再连任。

在他带领的历届理事会同仁的积极推动下，“热带”除了出版文学期刊，也陆续推出文艺丛书，并多次举办文学讲座及研讨会。

2008年11月，方修获首届“南洋华文文学奖”，他捐出所得奖金4万新币，作为鼓励年轻作者从事华文文学创作之用。“热带”迅即展开“方

修文学奖”筹办工作，在方修所捐款项的基础上积极筹募义款，以充实文学奖基金。一年后，“方修文学奖执行委员会”成立，长河任执委会主任。

2011年3月19日，“方修文学奖”宣布启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堪称新马文学界一大盛事。

2017年，连任九届的长河主动让贤，交由谢声远接任。四年后（2021年），邹文学接任热带文学俱乐部会长至今。

青春不老

不再担任会长的长河并未退出新华文坛，含饴弄孙之余，他依然沉浸于自己钟爱一生的华文文学创作之中。

偶然性起，他还是会写起诗来。2023年11月，他把从事诗歌创作以来的所有作品汇集出版，是为第三部诗集《绿的颂歌》。该诗集还收录了多篇别人为他所写的诗评。

目前，他正在忙于第七部文集——《世道文心》的编辑整理工作，不久将付梓出版。

他的诗集《绿的颂歌》中有一首值得反复吟诵的长诗，题为《青春不老，生命有价》。这八个大字，是他诗情泉涌时的真情流露，直接搬过来，即可作为对他一生最为真实的写照。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后记

踏足新华文坛之前即听闻过长河之大名，但可能机缘尚未到来，及至开始撰写《文坛掠影》之时，对这位文学前辈的认识依然十分有限。加上后来他的退居二线，再加上我生性懒散，更让我连跟他擦肩而过的机会都不曾有。

几个月前吊唁老作家张挥时碰见文友林锦，他告诉我廖建裕值得一写的同时，也提起了“热带”前会长长河。

写完廖教授之后，即从伍木那里得到长河的联系方式，但最后还是拜托石君帮忙穿针引线。

中秋节过后的那个星期五下午，终于走近长河位于淡滨尼的住家。从不迟到的我提

早十来分钟行至他家门前，准备确认一下门牌，然后躲在一旁等时间。不想刚一探头，即看到一张慈爱的笑脸，原来他家大门早已为我打开。三四个小时之后，我们已俨然相识多年的老友。离开的时候，我的手里除了他的赠书及资料，还多了一盒包装精美的月饼——来自他的老东家中国银行的节日礼物，就由我及家人代为享用了。

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我们随时互通信息。我一有疑问他即问即答，且不断补充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专访稿如期完成，对长河的认识依然浮于表面，唯愿我抛出的砖能引出珍贵的玉来。

感谢林锦！感谢伍木！感谢石君！

我的重要“角色”

顾芝绮的戏剧人生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第一次见到顾芝绮老师是在一个雨水缠绵的星期六下午。她坐在位于西部一家商场内的著名咖啡厅外，当时她的脸色虽略显苍白，却掩不住那双明亮有神的眼睛。身旁的拐杖无声地诉说着她最近的经历——一次在表演中的意外摔倒让她接受了手术，不得不在家静养数月。然而，最令人敬佩的是，尽管身体受伤，她当时在舞台上没有一丝退缩。她带着伤痛，坚持完成了整场演出。那份骨子里的韧劲与对戏剧的执着，让人深深为之动容。

体验不同角色是人生目标

1991年，芝绮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转业军人。母亲热爱艺术，经常参加文艺活动，如今是一名武术教练。耳濡目染的芝绮，从小便展现出对艺术的浓厚兴趣。幸运的是，家人始终支持她的梦想，从未阻碍她的脚步。父母在她四岁那年，为她在少年宫报读了民族舞。这所为少年儿童提供艺术教育和文化活动的校外机构，成为了她艺术启蒙的重要起点。起初，她只是那个安静站在角落的小女孩，专注地看着大姐姐妹们在舞台上翩然起舞，聆听音乐的节奏，感受旋律的律动。渐渐地，在导师们的悉心指导下，她的天赋与努力被看见，她从旁观者蜕变为台上的舞者。当她小小的脚尖第一次轻触舞台木板时，一种无言的默契仿佛在她心中升起——她的生命注定要与聚光灯相伴，在舞台的璀璨中熠熠生辉。

五岁那年，妈妈带她报名参加了上海颇负盛名的小荧星艺术团。虽然考官们都很喜欢她，但由于年纪尚小，她遗憾落选。直到六岁再次报名时，她凭借自身的天赋和努力顺利通过了选拔，正式成为艺术团的一员。原本，妈妈是为她报了戏剧组，却意外地被分配到了舞蹈组。虽然与最初的期望有所不同，



顾芝绮近照（姚耀光摄）

但这段舞蹈训练的经历却成了她艺术成长的重要一环。舞蹈的细腻与精准，让她在表演时更加注重肢体的协调与情感的传达，以至她塑造的人物更加立体与生动，每个角色都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层次感。

“我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就已经确认了我的人生目标，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我清楚地记得，每一年在同学的纪念册上，我都会写下一句话：我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我虽也曾梦想过成为医生、律师、服装设计师等，但有一天，我突然醒悟：只要我成为一名演员，我就能在戏中体验各种职业，演绎不同的人生。”

这样的领悟，对于七、八岁的孩子来说，显得尤为珍贵和超前。当大多数孩子仍沉浸在单纯的游戏和天真的幻想中，芝绮却已经开始思考人生的多样性与职业的可能性。这种成熟的思维方式无疑展现了她早慧的天赋和敏锐的感知力。她从未将演员视为单一的职业，而是将其当作通往无数人生的桥梁——通过舞台，她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体验不同角色的喜怒哀乐，感受各种身份的真实与精彩。

她的早慧不仅体现在对未来的规划上，还表现在实际的艺术实践中。在小学二、三年级时，她已担任文艺委员，能够独当一面地编排各类节目，从儿童节的舞台表演到毕业典礼的策划执行，无不游刃有余。在八岁那年，她首次独立编排了舞蹈作品《数鸭子》。尽管年纪尚小，她却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创意和编舞能力。她对音乐节奏的把握、动作设计的连贯性，以及舞蹈情感的表达，都令人刮目相看。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作品虽不算完美，但却充满童真与灵性。这不仅展现了她与众不同的艺术潜力，更凸显了她对舞蹈的热爱。那一次尝试，仿佛一颗种子，在她的心中埋下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也预示着她未来无限的可能性。

在准备升入中学时，芝绮原本计划在上海报读艺术学院，然而却因未能找到合适的学校而遗憾搁浅。但她并未因此放弃对艺术的热爱，而是积极调整心态，尝试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初中期间，她展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创作才华——她将一篇课文改编成了剧本。尽管这个剧本最终未能搬上舞台，却标志着她在剧本创作上的天赋初露锋芒。中学即将毕业时，芝绮再次向母亲表达了就读艺术院校的强烈意愿。皇

天不负有心人，这一次她终于如愿以偿——经过专业考试，她成功考入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正式开启了系统性的戏剧训练。在这所学校里，除了与其他高中生一样完成文化课程外，她还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学习舞蹈、声乐、台词等艺术表演课程。求学期间，她还代表上海戏剧学院附中随团赴海外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积累了丰富的跨文化经验。2006年，她赴日本参加游学，与当地学生共同探讨艺术与文化；2007年，她又随团前往德国法兰克福，与当地学生进行深度的文化交流。这些经历拓宽了她的国际视野，也坚定了她在戏剧表演领域不断探索的决心。

从不起眼的小角色做起

高中毕业前夕，学院的校长鼓励她报考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2009年7月3日，仅有18岁的她独自提着行李箱踏上新加坡的土地，从此开启了她与新加坡及南洋艺术学院的深厚情缘。天性活泼好动的芝绮在求学期间从未停下脚步，早在2009年底便主动联系了新加坡艺术剧场，从此和新加坡艺术剧场结下不解之缘。

“第一次到新加坡艺术剧场时，刚好遇到艾姐（艾家琪）在排《我是笨小孩》。她当时给了我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扮演一名群众演员。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我认真投入的态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甚至夸我演戏自然，觉得我有表演的天赋。2010年初，我接到了第二部戏《丑小鸭》，在其中担任主要配角，饰演丑小鸭的姐姐。这次演出让我得到了许多认可，导师夸我演戏投入，表扬我在非戏份期间依然保持角色状态。”



顾芝绮（前排左）在法兰克福文化交流时和寄宿家庭成员合影

芝绮的演艺之路始于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初次登台时，她只是舞台角落里的一名默默无闻的群众演员，几乎无人注意。然而，她始终对表演怀抱热情，用心对待每一个角色。哪怕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或一句台词，她也力求做到最好，用细致的努力为舞台增添光彩。她的勤奋与天赋逐渐被导演和观众看在眼里，机会也随之而来。从不起眼的小角色到主要配角，芝绮用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表演打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最终，她凭借过人的实力赢得了主演的机会。儿童剧《丑小鸭》在2010年7月重演时，她成功当上了主角，她把丑小鸭从自卑到蜕变的成长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这不仅是角色的蜕变，也是芝绮自身演艺生涯的重要飞跃。此后，她陆续参演了多部儿童剧，如《哪吒》《你们真坏蛋》《西游记》《小蝌蚪找妈妈》《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并在这些作品中担任主要角色。她在每一次演出中都全力以赴，用生动的表演让角色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参演过的众多演出中，我最喜欢《王子与乞丐》和《哪吒》。主要是这些角色在生命里曾经遭遇波折，但他们后来都蜕变成为更好的人。例如在《王子与乞丐》里，我饰演王子。这个角色情感特别丰富。小王子从一开始的无忧无虑、任性，到后来离开皇宫，面对现实世界的残酷，他目睹了公爵们如何剥削和压榨百姓，导致百姓们民不聊生、苦不堪言。这一切让他逐渐觉醒，慢慢变得勇敢、承担责任，最终成长为一位受人民爱戴的好国王。我非常喜欢这段充满成长与蜕变的小王子经历，它让我深刻体会到角色的转变和情感的丰富。”

勇于挑战多种类型的“角色”

除了儿童剧，芝绮在南洋艺术学院求学期间，也参演了不少话剧演出，如《八个女人》里的凯瑟琳、《后宫甄嬛传》里的安陵容、《玩偶之家》里的娜拉、《日出》里的小东西、《大雷雨》里的瓦尔瓦拉、《三块钱国币》里的吴太太、《婚事》里的阿琳娜、《结婚》里的花田花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里的飞飞等性格迥异的角色。不论是复杂内敛的心理角色，还是情感激烈的戏剧人物，她都能得心应手地诠释，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她勇于挑战不同角色，突破自我。从刚强隐忍的女性，到柔弱天真的少女，再到内心纠结的反派人物，每一个角色在她的演绎下都能令人信服。若说“没有她无法胜任的角色”，这句话一点也不为过。

不仅在舞台上勇于挑战多种类型的角色，芝绮在台下同样才华横溢，展现出全能戏剧人的风范。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在剧场幕后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剧本创作、导演统筹，还是舞台设计、服装制作，她都亲力亲为，力求每一个细节臻于完美。她深知，一场成功的戏剧演出不仅依赖演员的表演，更仰仗整体舞台氛围的烘托。因此，她会精心挑选服装布料，深入研究历史背景，甚至亲手制作道具，确保舞台上的每一个元素都与剧情丝丝入扣，打造极具沉浸感的观演体验。

我的重要“角色”

除了在舞台前与幕后全力以赴，芝绮还积极投身戏剧教育，致力于将华语戏剧的美妙世界带给更多人。她深信，华语戏剧不仅是一门艺术，



在南洋艺术学院毕业大戏《八个女人》演出后，演员们与顾威导演合照（后排左二为顾芝绮）



《环保小天使》在2019年中国南宁东盟戏剧周演出，顾芝绮（中）饰演主角康康

也是一种能够启发思维、培养创造力的媒介，更是弘扬华族文化的最佳渠道。多年来，她在多所中小学及社区剧场担任戏剧教练，因材施教，引导学员掌握表演技巧，并在舞台上建立自信，用优雅标准的华语台词，来浇灌学子的心田。无论是初次接触戏剧的孩童，还是有志于深耕表演的学员，她都以耐心和热忱激发他们的潜能，让每个人都能在戏剧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她的悉心指导下，多所中学如巴耶利峇美以女子中学、武吉班让政府中学、圣尼格拉中学等，在新加坡青年节（SYF）华文戏剧节中屡获殊荣。

芝绮的才华与对戏剧的热爱不仅在新加坡广受认可，更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她曾于2017年和2019年随新加坡艺术剧场代表新加坡参加中国南宁东盟戏剧周，凭借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舞台表现，在2017年荣获“朱槿花·优秀演员”称号，而新加坡艺术剧场也凭借精彩的演出，两度斩获“朱槿花·优秀剧目”（2017及2019），赢得国际戏剧界的高度评价。

2023年12月6日至10日，芝绮第三次随新加坡艺术剧场远赴中国广西南宁，参与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的优秀剧目展演。在这次艺术盛会上，新加坡艺术剧场携儿童剧《骄傲的小白兔》及舞蹈《小娘惹》亮相，与来自中国及东盟各国的艺术团体同台献艺、切磋交流。这不仅是一次舞台上的较量，更是跨文化戏剧艺术的融合碰撞。在演出过程中，芝绮以生动细腻的表演，将《骄傲的小白兔》中那只活泼、自信又略带骄傲的小白兔演绎得淋漓尽致，赢得现场观众与评委的一致好评。她精准拿捏角色的情绪变化，结

合丰富的肢体语言，使角色更加立体鲜活，让观众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之中，深受感染。此次南宁之行，新加坡艺术剧场凭借出色的舞台表现，再次荣获组委会颁发的“朱槿花·优秀剧目”荣誉证书，而芝绮也凭借精湛的演技，再度获得“朱槿花·优秀演员”荣誉证书。这份荣誉不仅是对她个人艺术造诣的肯定，更是对她多年辛勤耕耘的最佳回馈。

“我很高兴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虽然我不是明星，也不是家喻户晓的演员，但我问心无愧——无论角色大小，我都全心全意地投入，从不轻视任何一个角色。作为华人，在新加坡能够借华语戏剧这个平台，来实现对华族文化的弘扬，我觉得这也是我的重要‘角色’。就如我的导师周迅曾经鼓励我的那样，我一直坚定地走在自己热爱的道路上，而我也确实做到了。”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2017年，赴中国广州蓓蕾艺术剧院交流演出，在《王子与乞丐》中饰演王子



顾芝绮（左）在《骄傲的小白兔》中的造型

两次获得“朱槿花·优秀演员”荣誉证书

两地书 南洋情



文图·潘梅

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曾出版过一本书，书名是《两地书》，记录了鲁迅与爱妻许广平的通信往来，虽然是私人之间的交流，却也见证了时代框架下社会与文化的动荡与变迁。鲁迅在序言里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

历史永远不乏神奇的故事。80年后的2013年，在新加坡，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与本地文人、学者郑子瑜1958年至1966年前后约十年间的通信手札也神奇地在一次小型拍卖会上面世——全部95通两地书。该两地书记录了五四以来中国最有争议的著名文人在特殊年代的一段心路历程，留下足以扼腕历史的南洋佳话。

未曾谋面的文友之情

周氏两兄弟，哥哥周树人即鲁迅，被誉为中国文化的魂魄，中华民族的脊梁；而弟弟周作人，因在日本侵华时期滞留北平，为日方效力，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民国政府审判为通敌汉奸、国家罪人，投入南京老虎桥监狱。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幸遇毛泽东宽待，示意中国还是要留下一个懂得希腊文的，周作人得以苟延性命。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以书信寄托最终的文学梦想——希望在新加坡出版仅有的两部诗集的第二部，并以文人特有的蝇头小楷，完整无误地抄录了“迄未示人”的诗稿。最终这批珍贵的手迹留在了新加坡。可惜的是，他与郑子瑜往来书信中的绝大部分，却在珍藏40余年后，被迫与诗稿分割，从此远离狮城。

郑子瑜是福建漳州人，出生于1916年，随家移居石码镇，是清代诗人郑开禧的后裔。郑子瑜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现代文学家，修辞史学者，所著《中国修辞学史稿》深受日本学界重视，先后被日本早稻田大学及东京大东文化大学特聘讲学，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郑子瑜早

年对1891年至1894年担任首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兼管新马两地华人事务的黄遵宪极有兴趣。1936年，周作人在上海《逸经》杂志发表评论黄遵宪的文章，在福建同为该杂志供稿的郑子瑜看到后主动写信向周作人求教并获回复。此为两人结缘之肇始，日后战乱迭起，不得已联系中断。

1958年，已移居新加坡的郑子瑜结识黄遵宪的侄儿黄伯权，重拾黄遵宪研究，遂再次生念，写信联络在中国备受冷落的周作人，请教有关问题。当时，中国正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及经济困难时期，周作人在北京的生活多不如意，颇为潦倒艰苦，导致营养不良。郑子瑜得悉后，在请教学术问题之余，常以邮寄方式借道香港，将方糖、罐装猪油、奶粉、咖啡等物品断断续续寄给他。周作人彼时身处窘境，自然十分感念这份来自南洋的温情。每次回信，必恭称“子瑜先生”，落款自署“作人启”，常有“乞费心”，“至感嘉惠”或“至为感谢”之词，有时还耐心言明海关未课税捐，不必他额外负担费用等细节。二人的交流截至1966年文革开始而中止，隔年周作人

过世，两人始终未曾谋面。

在与郑子瑜的通信中，有一次周作人曾提到刘儂英女士。在信中，周作人写道：“刘儂英女士亦已有来信，拟寄回信而不知英文如何称呼（当写Mrs，而不明其夫家之姓，如写Miss，亦似不妥），故附上，乞费心一转为荷。拙诗集，朱君来信云已收到……”信里提到的刘儂英，推断应为香港或新加坡本地的女士。周作人是国学大家，曾留洋日本，言语之间，自然彬彬有礼。昔日他名冠华夏，高高在上，何等风光，此时居然对一位并不十分熟悉的女性友人不敢以简单明了的女士来称呼，转而反复向郑子瑜求证，以求礼貌妥当，其小心翼翼的心态表露无疑，读罢着实令人心酸。

古人有云，寿则多辱。以当时的情势，周作人虽然精通希腊语和日语，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特邀约稿，翻译希腊以及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但一直被旁敲侧击，稿酬亦有限，八口之家时常陷入困窘。他的日本妻子又常年卧病不起，医药费负担沉重。体弱多病的周作人双腿浮肿，1967年5月6日中午，仅食粥，饭后下地解手时猝死，连鞋都没来得及穿。

未曾谋面的文友之谊

周作人的这批诗稿手迹，是他留存于中国之外，数量最大的亲笔诗文手稿。其中部分内容经有关学者从中周旋，得以于1987年在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即第一部《知堂杂诗抄》。周作人原名櫛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此书因而得名。这批珍贵手稿的墨迹原件，在郑子瑜生前的2004年和过世后的2008年，分两个批次，经郑子瑜夫人及公子郑大宁医生同意，全部转让给本地报业闻人杜南发珍藏至今。

杜南发在《联合早报》撰文记载，郑子瑜在八十年代于《知堂杂诗抄跋》中曾写到周作人寄送手稿的经过，约略如下：

1958年1月，我曾写信给周氏，问他可否将生平的旧诗寄示，或者可以代为设法出版。然而周氏很客气，说他写的不知能否算是诗；待到我

将本意告诉他之后，他终于把他的诗稿寄下了，那便是这部诗集，原名《老虎桥杂诗》。

约在1959至1960年期间，周作人即先后陆续寄《老虎桥杂诗》《打油诗》《补遗》《题画诗》等手稿到新加坡，希望能合编一本诗集。《老虎桥杂诗》收《往昔》及《丙戌丁亥杂诗》各30首，《儿童杂事诗》72首，前者是五言古体诗，后者是七言的绝句，都是1946-1947年间在南京监狱中的作品。

后来周氏又陆续寄给我《所谓五十自寿打油诗》2首，《苦茶庵打油诗》24首，《苦茶庵打油诗补遗》20首，《题画诗》59首，以及《老虎桥杂诗补遗》13首（是1934至1949年间的作品），吩咐我将这些诗篇和前此寄下的《往昔》《丙戌丁亥杂诗》《儿童杂事诗》合为一集，改名为《知堂杂诗抄》。

周作人一生写作多达1100万字，却只有约300余首诗，数量不多，故一向备受瞩目。

同郑子瑜一样，杜南发与周作人也是十分有缘。1966年，中国爆发文革，周作人求助于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冀望能刊发尚未面世的国学研究著作《十山笔谈》，但可惜直至去世也未达成。章士钊是毛泽东的故友，1920



周作人肖像
(图源：互联网)

年，毛泽东为湖南新民学会青年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曾专门求见章士钊，章慷慨解囊2万银元襄助，自此结下交情。章士钊养女章含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过毛泽东的英文老师，亦是绰号“乔老爷”的时任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妻，章含之的女儿洪晃现在也是一代名媛。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友人看到时机，又费尽艰辛将周作人的遗稿转托香港朋友寄至新加坡。当时杜南发任职《南洋商报》编辑，于是发表，此时距周作人完成此稿已近30年，杜南发与周作人第一度结下不曾谋面也没有机会谋面的文友之谊。时光倏忽又过了30年，杜南发多年后再度幸运地得到了周作人的全套诗稿手迹。这是什么样的机缘？这是什么样的巧合？如果没有南洋，如果没有新加坡，就没有这一切。那样的历史，将是多么令人遗憾。最终明珠有主，蔚为美谈。

未曾面市的两地书

这部诗稿之外的最重要文献就是郑子瑜与周作人的两地书。先是由新加坡本地一间名不见经传且新成立的拍卖公司拍出。不久，北京匡时拍卖公司老板闻讯专程抵达新加坡，商谈将这一批珍贵书信再次在北京隆重拍卖。最终，他们见到了这批信札的持有者赵峰。2014年春，匡时取得全部书信中的84通，无一漏拍，成交总价约

人民币800万元。

赵峰，一位来自北京，旅居新加坡多年，深受文化与艺术熏陶的收藏家与实业家。他与南洋的机缘，也牵涉到对南洋影响殊巨、七次来到新加坡的中国美术大师徐悲鸿。赵峰的父亲是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的副馆长，馆长是徐悲鸿夫人廖静文。赵峰毕业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1995年南来新加坡，入南洋美术学院广告设计专业学习。他毕业后自创企业，现在Genting Lane附近工业区的一栋独立建筑里办公，有大量藏品，俯仰之间，都是名家字画和各种古旧陶瓷、器物。一楼还设书画装裱车间和宽敞明亮的艺术展览空间，常年以极低费用资助本地艺术家在此举办展览。

2006年华人新年，郑子瑜还在世，赵峰曾慕名登门拜访。他谈吐有度，深得郑子瑜赏识，结下前缘。当年在南艺学习时，赵峰也曾寓居本地早期女画家，以一人之力创办新加坡艺术学院的沈雁家中。沈雁过世后，赵峰协助整理遗物并收藏大量的沈雁作品及有关文献，很有远见地保存了许多重要资料。如本地美术名家翁锡礼、童振狮等人及知名企业家郭明忠当年的入学登记表和学院各年度结算及收支报告等，留下珍贵的研究史料。他与有“东南亚船王”美誉的印尼商人唐裕亦多交集。唐裕富甲一方，收藏颇丰，曾担任新加坡有120年历史的吾庐俱乐部主席，现赵峰处仍存有不少唐裕旧物。

赵峰家学深厚，深知文物及文献资料对于人文历史的重要性，在获知郑子瑜与周作人往来书信即将在本地拍卖之际，即刻出手，终有所归。不过，出于对历史与文化的尊重，他同意将刚刚入手的这批手札交由北京匡时再度拍卖，最终回流中国，回到周作人曾经长期生活和终老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拍卖结束后举办座谈会，杜南发受邀撰写《周作人致郑子瑜信札与知堂杂诗的出版》专文，作书面发言。周作人的后人事后也曾带领中国中央电视台来新加坡采访，回顾郑子瑜与周作人的南北两地书奇缘。

除去赴日讲学，郑子瑜也曾赴香港中文大学执教一段时间，晚年退居新加坡市中心的建安大厦顶层，间或也在其他地方住过。察看周作人写





周作人致郑子瑜信札及信封

给郑子瑜的信件，信封上的地址分别用毛笔写着华文和英文，都能准确寄达。华文地址多是马耶路小路，英文地址则是Jalan Kechil。然而，笔者搜遍新加坡现今的地图却很难找到上述地址。不过，在新加坡对面的马来西亚柔佛，却有明确的Jalan Kechil这个地方。那么，1962年周作人寄到Jalan Kechil的信，是寄到新加坡还是柔佛了呢？本地资深文史学者、作家李国樑最终谨慎解答了这个问题。起初，他分析如今在加东一带，有一个地方叫Meyer Road，可能就是当年的马耶路。那一带以前有不少马来村落和如今已经消失的小路（Kechil）。最后，他甚至还热心地找到一张细微的地图，直接标识出位于Amber Road附近的Jalan Kechil。

未曾离开北平的周作人

周作人的一生起起伏伏，充满争议。周作人与鲁迅曾经是民国以来中国文坛的双峰，然而，兄弟两人最终不仅在生活上分道扬镳、不欢而散，在民族大义上，也选择了诀别。周作人听信日本太太的一面之词，指责大哥鲁迅偷窥弟媳洗澡，以一纸绝交信掷于鲁迅面前。鲁迅骤然惊悚，愤而携带母亲和妻子朱安搬离北京阜成

门内八道湾胡同的周家大院。二人就此分道扬镳，至死未复相见。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周作人没有随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他选择与日人合作，复于1941年元旦，上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之职（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特派），1944年时兼任中日文化协会理事。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在北平以汉奸罪被捕并押解南京受审，1946年被判14年徒刑，1947年改判10年刑期，1949年1月被特赦。1964年后，经曹聚仁介绍，周作人在香港出版回忆录《知堂回想录》。1967年去世，享寿82岁。

周作人生命的最后10年是孤独的、可怜的，但也是幸运的。一纸薄笺，几行蝇头小楷，寄托了他的多少情思与文思，从寒冷的北京一路向南，直抵器热的南洋之地新加坡。郑子瑜历尽千帆，功成名就，却未改初心，不加歧视，始终如一地尊敬他、爱护他、关心他、不离不弃，显示出纯粹的读书人的理性、谦卑和至诚。

那用毛笔写就的书信，或浓或淡的字迹，有些地方甚或湮灭不清，人生大抵也是如此吧。

（作者为本地文史爱好者）

老朋友无限感慨地对我说：“现在过新年，好像没有小时候的年味那么浓郁，也没有那种兴奋的感觉了。那时，在农历12月开始，我们就翘首期盼新年的到来。因为只有庆祝新年时才有机会吃鸡鸭鱼虾、吃糖果、喝汽水、穿新衣和新鞋。现在，我们常常吃鸡肉鱼肉，平常也可以买衣服鞋子，不必等待过年。因此显得过年也没什么特别意义了。”

我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心随境转，环境改变，心情当然不一样。但我觉得过年还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尽力把年味留住，守住传统。

在岛国的拓荒时代，我们的父辈胼手胝足，所得的收入也足够让一家温饱。能够在新年期间杀鸡煮肉，与家人聚在一起吃团年饭，传承传统节日的习俗，过简朴安定的日子，已是人生的大幸了！

时光流逝，凭着前辈的努力耕耘，上下同心建设国家，岛国已从第三世界国家晋升入第一世界：经济发达，繁荣富强，生活富裕，物资充足，衣食无缺。因此，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都能尝到各式美食。以物质享受来论过年，当然会觉得过年没意义，觉得年味变淡了。

过年，在中国叫做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辞旧布新、祭祖感恩、合家团圆、亲友聚会、美好祝愿，是对未来寄托新希望的佳节。早年移居到中国海外各地的华人，都延续这个传统。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在2023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将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2024年12月，农历新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据新闻报道，近20个国家将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欧美许多国家的地标建筑点亮了中国红，还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春节民俗活动，年味不但没有变淡，反而散发到更多的地方，弥漫一片温馨祥和。

传承年味



文图 · 冯焕好

我们这里的华人也传承这个节日和习俗，赋予它新的内涵和展现方式，年味比过去更加浓郁。春节前，市中心和组屋区内的大小商店，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披上新妆：门楣上的横幅和对联，门外的红灯笼，屋内的贴纸和挂饰，张灯结彩，红艳灿烂，相互辉映。牛车水街头每年都经过一番设计，竖立各种形态巧妙的生肖灯饰，挂上寓意吉祥的旗帜，白天在空中飘扬，夜里则灯火璀璨，熠熠生辉。那里的年货市场，琳琅满目，人头攒动，热闹喧哗。我们每年举行春到河畔和妆艺大游行等大型活动，有精彩纷呈的文娱表演，融入跨地域的文化元素，五彩缤纷。各个社区、宗乡团体和许多学校都举行新年庆祝会。教堂和庙宇也有祷告和敲钟等不同的祈福仪式。年味弥漫，年味浓郁，在满眼的流光溢彩中，人们都可以在喜庆气氛里，找寻记忆中的年味和浓厚的过年氛围。

春节前一周，我到碧山民众俱乐部出席挥春活动，看到几个书法家挥毫泼墨，写出各种字体造型的“福”字、吉祥对联和贺年祝词，条条幅幅，红彤彤一片，然后用抽签方式，让来宾们把春联以及无限祝福和喜气带回家。

华中初级学院校友会每年都举行新年庆祝会，邀请已退休或离职的老师欢聚一堂。曾是学院一员的我不缺席，一定会回去重温当年。庆祝会上，校友书画学会会员正在挥毫，就像当年在学院的春节庆祝会上那样忙碌；醒狮表演之后，在响亮的锣鼓声中，一条金龙出现。细看一下，是不同届的校友组成的舞龙队，在锣鼓声中翻舞飞腾迎新岁，他们舞得还很专业呢！精彩极了！

睽违多年的老同事和不同年代毕业的校友相互祝贺，祝福之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我们一起捞鱼生，吃自助餐，并絮絮叨叨闲话当年。临别，老师们还获赠校友赞助的蛋糕和桔子。

想起学院初创时，我们就设定要全院庆祝中秋节和春节这两个华人的传统节日，由学生理事策划和安排节目。无他，为了让学生认识传统文化、担当起传承文化的重任。50年过去，这两个节日庆典在学院从没间断，即使疫情期间也在线上进行。如今，喜见校友会还承续这个传统，留住年味。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当年播下的文化种子，如今已开花结果，生生不息！

令我惊喜的是那个雨后放晴的早上，我到牛车水办年货。看到一群又一群的幼童和小学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逛牛车水。这应该是幼稚园和学校安排的校外学习活动，让孩子们观看迎接新年的盛况，感染过年的气息。老师牵着学生，穿梭在林林总总的摊位前，边走边讲述，这是一堂多有意义的生活课啊！

孩子是人类的春天，国家的未来。保留年味重在传统文化传承，当年味渗入孩子们的脑海里后，将来他们必定会让岛国的独特年味，绵延不断！

(作者为资深教育工作者)



丁加奴街的中国剪纸、灯笼、流苏充满新年气息



戏院街年货腊味档



“挥春”让来宾们把春联以及无限祝福和喜气带回家 (Tan Kim Hock摄)



历届华初校友与退休老师蛇年“捞起” (Tan Kim Hock摄)



2025年，牛车水的蛇年灯饰

新闻图景中的印尼糖王 黄仲涵



文图·陈焯

1924年6月3日凌晨，黄仲涵（Oei Tiong Ham，1866-1924）在新加坡武吉知马住家心脏病突发逝世，年仅58岁。消息传出之后各界震惊。这位精力充沛的印尼糖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华人”，几天前刚将公司事务安排妥当，准备退休享受生活，最宠爱的七夫人何金华娘正怀着他们的第五个孩子……

黄仲涵及其所建立的商业帝国，至今仍是印尼华人史与经济史研究关注的课题之一。长期以来有关其家族生活的描述，主要源自次女黄蕙兰的书写。她生前以顾维钧夫人的名义与人合著，在美国出版了两本英文自传——*Hui-lan Koo, Madame Wellington Koo: An Autobiography* (1943)，以及 *No Feast Last Forever: Madame Wellington Koo* (1975)。第二本自传于1988年由天津编译中心翻译出版，题为《没有不散的筵席：顾维钧夫人回忆录》，2018年修订后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发行。1989年，日本历史学家吉原久仁夫主编的《黄仲涵财团：东南亚第一个企业帝国》一书，其中第二章回忆录是由黄蕙兰所提供，此书由周南京翻译成中文，于1993年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近年来，马来西亚独立研究者叶柳心从女性研究的角度，展开对于黄仲涵家族三位女性——何金华娘（七夫人，Lucy Ho）、黄蕙兰（元配次



玛腰黄仲涵（图源：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1923年，页205）

女，Angela）、黄敏娘（五夫人次女，Ida）的研究，完成题为 *As Equals: The Oei Women of Java* 的论著，此书于2024年由世界科学出版社出版。由于作者与黄仲涵后裔的关系，得以运用家族内部档案资料，较为真实地呈现了这位印尼糖王的家庭生活与子女教育。

黄仲涵生前虽写下遗嘱指定执行人，但子女遗产分配差异极大，引发继承人的纷争并诉诸法庭。由于各国对于遗产继承权与遗嘱效力有着不同的规定，黄仲涵国籍身份的认定成为诉讼的重点。尽管黄仲涵身份显赫，生前周游列国，在各国投资置产，竟无人能确定其国籍身份。他可能同时拥有荷兰籍、英国籍、中国籍与日本籍。然而，黄仲涵的祖籍明确，其父志信是由福建省同安县灌口李林村前往印尼的华侨第一代。本文通过整理早期新闻报道以及在闽南的田野调查，呈现黄仲涵在新加坡、厦门鼓浪屿与同安灌口的若干事迹，探讨南洋华侨华人第二代与原乡的关系，海外后裔与原乡沟通所面临的窘境。



约1923年，黄仲涵、何金华娘与子女合影（图源：黄仲涵家族）

印尼糖王与新加坡

一般认为，黄仲涵为了躲避荷属东印度的严苛税收，1921年左右携七夫人何金华娘与子女移居新加坡。事实上，他很早就建立与英国海峡殖民地的密切交往，不仅将子女送至新加坡读书，亦时常造访本地，以三宝垄华人玛腰的身份出现于上流社会，与华人精英过往甚密。早在1902年，黄仲涵为维多利亚纪念基金（Victoria Memorial Fund）捐款1000元。1905年春节，他带着长女宗兰与次女蕙兰，陪同海峡殖民地总督出席观看芳林地举办的华人体育竞赛。贵宾们在华人体育会的亭子中避雨观赛，随同的华人贵宾还有陈若锦、林文庆医生、殷雪村医生等。不难看出，黄仲涵在本地华社已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新加坡，黄仲涵通常被称为三宝垄华人玛腰，也常以海峡殖民地华人的身份参与慈善活动，以其财富为华社争光添彩。例如，1915年他以新加坡协荣茂船务有限公司主席的名义，为威尔士王子基金捐款5000元。1916年以马来亚华人（新

加坡）的身份购买25万战争债券，是购买债券份额最高的个人，仅次于华商银行（40万），远高于分别购买10万元的林秉祥与李浚源。

由于黄仲涵遗产继承问题的纷争，印尼方面展开调查，估算其产业价值。在荷兰报纸上公布的信息是：“黄仲涵糖公司（四千万盾）、建源（四百万盾）、黄仲涵银行（四百万盾）、兰鲁沙里砖厂（一百万盾）、协荣茂轮船公司（一百五十万盾）、新嘉坡借出之款（三千五百万盾）、英伦存款（一千二百万盾）、现金（二千万盾），总计一百六十六兆五十万盾遗产。”这份非官方数据显示，黄仲涵的巨额财富中，除了在印尼的大笔资产，新加坡亦占有极高比重。

捐助本地教育慈善

早在移居新加坡前，黄仲涵就为本地教育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为华社所盛赞。为他刊发的出殡预告曾写道：“黄君仲涵生前为人众所嘉许，至其热心公益捐资助学，尤为社会所同钦。”黄仲涵一生捐助的项目难以统计。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他对教育机构捐助的数额巨大，所捐助完成的项目往往有着相当规模，多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国家古迹。

成立于1852年的圣若瑟书院，在1912年庆祝钻石金禧60周年庆祝会上特别提到黄仲涵的慷慨支持。早在1904年，因为朋友的介绍，黄仲涵慷慨为这所天主教男校捐出1000元修建铸铁栏杆。1911年再度捐款2000元兴建围墙。按照校方的说法，在此前四年，他已为该书院捐款累积6000元。1988年圣若瑟书院迁往新校区后，该建筑于1992年2月14日评定为国家古迹，1996年修复后作为新加坡美术馆。

黄仲涵慷慨助学留下的另一处国家古迹是原道南学校。1910年初，他以1万1000元买下阮添筹律师位于亚美尼亚路的宅邸，将其捐献给福建会馆



20世纪初的新加坡圣若瑟书院（图源：ROOTS）



新加坡土生博物馆（原道南学校。摄于2023年5月15日）



新加坡国立大学武吉知马校区黄仲涵楼（摄于2025年1月25日）

作为道南学校校址。1982年道南学校迁出后，该建筑于1994年重新装修作为亚洲文明博物馆的分馆，1998年2月27日被评定为国家古迹，2008年重新修复改造成为土生博物馆。

黄仲涵捐助款项最大、也最富盛名的教育机构是莱佛士学院。为了纪念新加坡开埠一百周年，1918年成立百年纪念委员会组织各项纪念活动，其中一个重大决定是成立一所提供人文与科学高等教育的学府，以莱佛士爵士命名，为此在海峡殖民地广泛筹款。1919年12月30日，黄仲涵指示其在新加坡的代理人李云龙（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祖父）致函给华民护卫司，表示愿意为筹建中的莱佛士学院捐款15万元，用以兴建作为庆典、接待、授课、颁奖的中央大楼，条件是该楼须以其命名。1920年1月7日纪念委员会迅速批准他的请求，虽然彼时黄仲涵仍是荷属印度居民，并非海峡殖民地居民。

为了兴建莱佛士学院，筹委会在当时的英联邦组织建筑竞赛，由伦敦建筑师赢得项目，形成围绕两个大草坪兴建的建筑群，中央各有一栋核心建筑，其中之一为黄仲涵楼。1949年莱佛士学院与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合并成为马来亚大学，1962年更名为新加坡大学，1980年与南洋

大学合并成为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这片校舍于2009年11月11日年评为国家古迹，如今是国大武吉知马校区。黄仲涵楼用作李光耀政策学院的办公楼，冥冥之中将李云龙与光耀祖孙二人联系起来。

黄仲涵的另一重大助学项目是为成立于1919年的新加坡华侨中学慷慨解囊。1923年为了在武吉知马兴建华中大礼堂，时任董事长陈嘉庚领导筹款，希望能够兴建一座可以媲美欧美的校舍，预计建筑费用是14万元，黄仲涵慨然承诺捐献10万元。1925年落成的钟楼大礼堂成为华中标志性建筑，其中的大礼堂命名为“黄仲涵堂”，该建筑于1999年3月19日评定为国家古迹。

与华社原乡的关系

在荷兰殖民时期，虽然贵为三宝垄华人玛腰，黄仲涵一生都在争取华人权益以对抗种族歧视，自父亲去世后剪掉长辫，终身西装革履。他在新加坡为教育与慈善事业捐款，并不局限于华社。在女儿蕙兰1920年嫁给顾维钧后，加强了他与中国的联系，媒体亦称其为“顾维钧岳父”。1922年10月，汉口明德大学校长胡元倓南来新加坡为扩建大学筹款。在顾维钧的介绍下，黄仲涵在中国总



1990年代的新加坡华侨中学钟楼（图源：Wikimedia）



鼓浪屿会审公堂旧址（原黄仲涵产业。摄于2024年12月22日）



厦门灌口镇李林村黄氏祠堂内景（摄于2024年12月20日）

领事馆会见了，表示赞许支持教育事业，并会将其介绍给在缅甸、泰国和爪哇的商业伙伴。胡元俊对这位世界上最富有的华人留下深刻印象：称他大约60岁的年纪、仪容端正、身材健硕、远看像是欧洲人；且举止友善、没有繁文缛节、富有同情心。

黄仲涵逝世后，其家族成员在办理丧事时，亦敦请以李浚源为首的16位华社名流在报刊共同发表“黄仲涵君出殡预告”，其中包括声名显赫的闽籍先贤薛武院、殷雪村、林秉祥、薛中华、陈延谦、丘国瓦等。这份通告说明黄仲涵灵柩于7月2日早8时由东陵住宅引发归葬于三宝垄之原，详细列出灵柩经由路线以及运送的船只。

作为出生成长于印尼的闽籍富豪，与同时代南来的第一代移民相比，黄仲涵与祖籍地的互动，以及在厦门的投资置产相对较少，原因虽然与其1924年猝然离世有关，亦显示海外出生的华人对于祖籍地的归属感较弱。笔者在研究鼓浪屿笔山路5号林文庆产业时，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一幅完成于1982年的测绘地图，详细记录林文庆宅邸及其邻居的产业状况。该地图清晰标注南侧产业为“前英国公会之地，现黄仲涵君地”，从而确定黄仲涵在鼓浪屿确有置产。根据厦门地方文

史的陈述，这一产业于1930年租借给鼓浪屿会审公堂使用。新中国建国初期，该产业登记注册在建源公司名下。然而，这一产业究竟何时为黄仲涵购得？建筑是何时兴建？为何租借给会审公堂？这些产业相关的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2024年12月，笔者与叶柳心一同前往灌口李林村考察黄仲涵事迹，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参访重建的黄氏祠堂，惊讶地发现神龛中摆放着洋人照片等。宗祠外高大的石碑雕刻着黄志信与黄仲涵生平，一侧矮墙上镶嵌着两块小石碑：一块记录着1994年9月22日为重建黄氏祠堂所签署的“协议书”；另一块题为“难忘的日子”，表达对于海外中间人林成喜的感激，称此人为“原印尼糖王黄仲涵女儿的儿子”。实际上，神龛中的洋人为黄仲涵三宝垄糖厂的工程师，林成喜是黄仲涵妹妹的曾孙。这些作法有意或是无意地混淆了黄仲涵家族谱系，通过立碑将不实信息加以史实化的作法令人堪忧，深感促进海内外后裔沟通的迫切性，须整合不同语言的研究成果以公布真实的家族信息。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兼任副教授）

“早操”

在新加坡的故事



文图·黄兰诗

早操，可能是本地再亲民不过的大众化运动了。在新加坡这一看似普通的健身运动，从特殊群体的“专利”到大众化，却也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过程。当我们回首时，仍能让人五味杂陈。

20世纪40年代前的早操——学生的“专利”

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殖民者把包括体操在内的现代体育逐渐带到新加坡，通过军队、社会俱乐部、体育俱乐部和教育部门流行开来。当时，除了军队以外，安排体操锻炼的仅为一些学校。

20世纪20年代的本地学校，有条件的不仅有体育课，还有早操（又称“朝操”“晨操”），即学生上课前，先集中在操场做10分钟左右的“早操”。不过，就南洋的华校而言，不少学校是利用祠庙会馆创办的，场地受限，很多连操场都没有，这样的学校当然就谈不上做早操了。

随着做早操学校的逐渐增加，1930年，政府教育行政机关要求将教师指导学生做早操，与正课等同计入报酬之中。1933年初级中学教部颁布的《课程标准》“体育”中也规定了“早操”锻炼，时间是“每晨10分钟”。正如当年《南洋商报》（1933年9月）载文所说，各校做“晨操”目的在于“行深呼吸练习呼吸官能，行柔软操，活经络，振起一日工作之精神。”有的学校为了不影响正课时间，规定学生提早20分

钟到校。

不过，有关早操并无统一教材，由各校自行设计动作。有些学校登报宣传自家特色时，还把“早操”列入其中，说明做早操仍未普及。例如星洲养正学校1939在报纸上宣传自己的“体育行政”时特别说到了“早操”，强调“早操能培养学生早起、守时、爱好运动的良好习惯，又能锻炼身体，调剂身心”。该校周一至周六早上8点到8点15分是早操时间，教材由教师根据年级自编，且定期更改。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参加，计入成绩，缺席者以缺课论。当年有“早操”的学校大概都是类似情况。有些既有寄宿生又有走读生的学校，开始是所有学生都要做早操的，但考虑到走读生到学校已是汗流浹背，诸多不便，后来只要求寄宿生早上6点多到操场出操。40年代初的南洋女中便是如此。

总之，在20世纪40年代前，“早操”已经在本地不少学校流行，成为锻炼身体、调剂身心的集体运动项目。

昭南时期的广播体操——奴化的工具

日本侵占新加坡后，全面实施奴化政策，致力于建设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强制本地人做广播体操。

据说，美国Metropolitan人寿保险公司为了促进客户健康，从1925年开始通过广播播送“广播体操”广告节目。受此启发，日本开始出现广播体操，并且从1928年起以学校为中心迅速流传。不过，这一单纯的健身运动后来发生

异变，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后，清晨做广播体操前唱国歌、面向皇宫方向遥拜，操后唱爱国进行曲成为日本民众的日常“功课”。本来是锻炼身体的早操被赋予了新的职能，成为政府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培育忠君爱国思想的工具。

日军侵占本地不久，要求各地“国民学校”选拔老师集中受训，在日本人指导下学做日本的广播体操（图1），然后回校教学生。在诸如“现地工人养成所”一类的教育机构，日本教员则直接带领学生做广播体操（图2）。广播体操从此在本地出现。

对于有无线电广播的学校，日本占领者要求收听东京中央放送局的无线电广播，跟随广播体操音乐与日本本土同时做操。在日军侵占前，本地采用的是新加坡标准时间7:30做早操，日军占领后强行将7:30改为日本的标准时间9:00，自此本地人的作息时间表整整提早了一个半小时。东京的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学校播送广播体操的时间是上午8:50至9:00。这样本地学校也是在此时间做早操。为了让本地人听懂东京广播，东京中央放送局还配备了马来语翻译同时解说（图3）。

日本政府发行的杂志《写真周报》1942年特地登载了东南亚各地民众在日军指挥下做早操的照片，所附文字说明：“盟主日本播放的明朗的广播体操歌声，将这广大的共荣圈各地域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共荣圈的确立是从广播体操开始的。”并且洋洋得意地说，昭南岛的“日本色彩亦在逐渐变浓，当地普及的广播体操也是日本色彩之一”。

这就暴露了统治者推行广播体操的真实目的，增进健康只是幌子，在日本“盟主”眼中，广播体操既是将“大东亚共荣圈”紧密相联的一种象征，又是一种典型的“日本色彩”。早操这一集体体育活动，在昭南时代实际上是奴化统治的工具。

战后到建国的健身操 ——全民健身运动的推手

日本投降后，早操回归到强身健体的固有“职能”。1947年教育部颁布《中等学校体育实施方案》，要求全体学生一律参加早操或课间操，每周公布一次缺席者姓名。不过，有关早操，本地中等学校仍无统一教材。

至于小学，有些学校连体育部都没有。所以，1950年本地华校体育教师联谊会建议：没有体育部的建立体育部，各校将早操与课外活动时间算入体育课节数内。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动员全民锻炼，增强民众体质。

新加坡电视台1966年3月16日起在晚间特设“健身操”系列节目，由教练教学示范，供观众模仿学习。广播电台也在每日早上6:45播送同一节目录音，供大家跟随节拍自行做操。报纸介绍该操简单易学，呼吁大家强健身体。这是新加坡建国后最早面向大众推广的广播体操，拉开了首个全民健身活动的序幕。

政府希望通过体育活动，促进全民健康、提高体育运动水平，由此实施了很多举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全民体育运动项目便是“早操”。



图1：本地老师学做广播体操
（图源：《写真周报》第258号，1943年）



图2：“现地工人养成所”学员做早操
（图源：《写真周报》第253号，1943年）



图3：东京中央放送局配备的翻译正在进行解说（图源：《写真周报》第250号，1942年）

计划”。

1968年11月，社会事务部长兼奥林匹克体育理事会长奥斯曼渥在“早操计划大会”上宣布从翌年起实行全国性早操，“目的在于增进人民健康，锻炼人民体格，以建立一个更安乐更强更猛的国家。”参加大会的国防部、文化部、教育部、全国职工总会、雇主总会、厂商总会、中华总商会、印度商会、马来商会、新加坡商会代表纷纷表示赞成，并且由上述与会者组成“全国健身操运动委员会”，研究实施方法加以落实。将“早操”改称“健身操”，大概是考虑到各机构安排的做操时间不一定是早上。

政府希望这项非强制性措施，能得到各方面的理解与全民支持，并且特别希望大企业积极参加，做好榜样。据说，报界对此计划尤其热心，有些企业家也热心支持，认为工作时间缩短了10分钟，但雇员可以焕发精神，工作更有效。

健身操由政府组织专家编排设计，动作适应男女老少在的平时穿戴，计划分两阶段实施。首阶段用数月时间普及第一套动作，共6分钟，待大家掌握后实施第二阶段。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还特地说明是为办公室的白领、主妇、体重

较重人士开发的。

计划公布后，作为先期准备，各政府机关与企业等派人接受培训，回去后担任健身操指导员。电台与电视台进行讲解示范，国防部与教育部派员到公共场所、社区示范。社会事务部还向企业与团体发放健身操唱片，以便随时随地使用。

经过各方面精心准备，1969年3月1日“早操计划”正式实施。当天政府通过广播电台与电视台播送体操音乐，700多名女生在社会事务部前进行健身操示范表演（图4），正好是下班时间，吸引了很多人围观。自此广播电台每天早上6点半播送早操音乐，企业等则自行安排做操时间。为了进一步推广，“全国健身操运动委员会”从3月中旬至5月上旬，派了1800名受过训练的学生分别到9个指定地点，向民众作示范。例如，3月18日笃德中学200名学生在国家剧场斜对面停车场进行了示范表演（图5）。

1970年3月3日，健身操计划推出第二套6分钟的动作，政府同样使用各种方法推广。例如人民协会属下的58间中心民众联络所事先培训了50多名秘书，每天在联络所义务辅导附近居民学习新操。

不过，尽管大张旗鼓推广，示范者也基本是学生，但主要动员对象是成人，体操似乎并未在学校推广。教育部为此在1974年鼓励各校推行早操运动。

此次“早操计划”是新加坡政府首次推动的长期全民体育运动，为政府今后总体规划与实施此类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加强了人们进行体育锻炼的观念。



图4：700多名女生示范表演
(图源：《星洲日报》1969年3月2日)



图5：笃德中学学生示范表演
(图源：《星洲日报》1969年3月19日)

新加坡体操运动——健康生活的象征

1992年全国健康普查结果显示，经常运动的国人仅为总人口的14%。政府为此发起了“全国健康生活运动”，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活动。于是，老少咸宜且随时随地就能进行的“体操”再次成为焦点。

1993年，政府将“全国健康生活运动”的主题定为“新加坡体操运动”，旨在培养国人日常健身的习惯。时任总理吴作栋希望国人“就像刷牙与看电视一样”，至少有一半的国人经常运动。具体举措是：政府将10月3日定为“全国健



图6：副总理李显龙带队跑步至体育场
(图源：《新明日报》1993年10月3日)



图7：总理吴作栋与民众在政府大厦前广场做体操
(图源：《联合早报》1993年10月4日)

康生活日”，决定在此日全面进行“新加坡体操运动”。

这次推广的“新加坡体操”由新加坡体能指导员协会与体育理事会联合设计，动作简单，只需要在原地运动，适合各种年龄。作为预热，政府在9月初向学校与团体分发了1万个示范用录像带，又通过电视、广播教学。9月4日起还在购物中心、地铁站外等地专人教学示范。

按照计划，10月3日在政府大厦草场及4个体育场设立做操地点，总理与政府部长从12个集合点分别出发跑步至上述地点做操。9月初政府在报纸上刊登上述计划，表示欢迎家人陪同老人，带着孩子踊跃参加。民众对此反应热烈，报名者超过5万。报名点还发放统一印有“新加坡体操运动”的汗衫与鸭嘴帽供当日穿戴。

当天的活动声势浩大。时任总理吴作栋、副总理李显龙、各部部长率先垂范，李副总理还带两子参加。在政府领导人的带领下，各队跑步数公里（图6），于9:45前分别进入5个场地，与直接入场的群众聚合。他们先在专人指导下学习，9时整则听广播正式做操（图7），共有6万多民众参加。

一国总理、部长同一时间与数万国民共同做操，在当时世界上大概绝无仅有。政府推动全民健身热情之高，用情之诚可见一斑。

其后数年，政府领导人一直坚持在“全国健康生活运动”中推动全民参加“新加坡体操运动”（图8），1995年8月27日，吴总理与各部长又与国民在政府大厦广场做操，尽管天气预报预测下雨，仍有3万517人参加，被《健力士记录》列为“世界最大的体操活动”。



图8：吴总理做新加坡早操
(图源《新明日报》1994年9月11日)

对于学生，教育部也积极推广全员做操。1993年，教育部规定9月30日为小学体操日，10月1日为中学、初级学院体操日，要求当天各校用15分钟时间做操。为了适合学生的特点，政府后来还开发出了一套“趣味健身操”，其动作比既有的健身操剧烈。1996年的“体操日”，全国学校在早上升旗仪式后做此体操。

通过如此多次大规模全民健身运动，强身健体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参加健身者越来越多，新加坡因此被认为是全球社区体育活动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曾荣获“最佳体育城市”金奖。

众所周知，国家的强盛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的繁荣，更需要民众健康的身体。因此，新加坡政府不断鼓励民众积极加强体育锻炼，提高整体健康水平，以促进国家的长期繁荣和稳定。相信早操（健身操）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升级”，在推动全民健身的运动中继续散发出独特的光彩。

（作者为晚晴园华文义务导览员）



人力车走过的历史踪迹



文图·陈伟玉

人力车是日本人所发明，日文称为Jinrikisha。1869年（明治二年）福冈藩士的养子和泉要助（铃木德次郎）以木箱加上木轮和把柄，箱中安牢椅子，由人拉着把柄行走，这是原始人力车的雏形。1875年，车篷改良弹簧式，出太阳或下雨时撑开，不然就折在后座。1897年日本人力车最兴盛时，产量21万6088辆，输出至上海、香港、新加坡、印度及埃及等地。^[1]

人力车俗称车仔，中国称为东洋车。1873年，人力车从日本引进中国。初期人力车有双人座和单人座；1912年10月市政局总检查官废除人力车双人座。1919年规定人力车的篷一律漆成黄色，因而有黄包车之称。民国时期，黄包车已经风靡中国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等地。

人力车输入新加坡

新加坡开埠初期，岛内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马车为富贵家庭的代步工具，而牛车是用来载货或运送井水。人力车于1880年从上海输入新加坡，适用于短程交通，车费便宜。人力车早班是早上5时出门，下午3、4时收工，而夜班是下午2时出门，早上4、5时收工。^[2]有的人力车

有固定客人，载去巴刹买菜，或者替小贩载菜及鱼到巴刹卖。上车五分或一角，短程车资二、三角，路程较远最多四、五角。^[3]人力车夫的装束是：有赤脚的、有穿胶底草鞋的，蓝色的上衣短裤，头戴一顶草笠。少数拉夜车的车夫，穿蓝衣蓝裤，穿梭于妓院和歌台之间。^[4]

1888年，英国殖民政府在丹戎巴葛路（Tanjong Pagar Road）、尼路（Neil Road）和麦士威路（Maxwell Road）的交界处设立人力车局（Jinrikisha Station），俗称车牌馆，专门处理人力车的注册、执照和价格，以及数量等问题。1892年人力局对人力车征税从\$1元到1年\$12元。^[5]

1901年，新加坡的公路仅有94公里，而人力车有6780辆。1911年，新加坡的公路延长至102公里，人力车增加到8791辆。^[6]20世纪20年代汽车开始盛行，使得人力车逐渐减少。1925年市政局对人力车的管制更加严格，对太陈旧和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人力车进行吊销执照，共有4200余辆被吊销执照。加上30年代小型巴士增加，无轨有线电车川行，以及人力车租金起价，进一步削减人力车数量。1937年人力车仅有3704辆。

兴化与福清人是人力车主力

兴化人南来的时间，比其他籍贯的人迟，因为当时的兴化还是小农经济，安土重迁、不远离父母的传统思想观念浓厚。据黄枝连指南大学生《兴化人与交通行业》一文的记载，“1921年兴化人1659名，到了1931年增至31,025名。兴化人在这期间南来较多，是因为中国发生内战，国民党与共产党对抗，闽粤农民无法谋生，只好易地而居，兴化人也在这时期大量移居东南亚。”^[7]很多新马的兴化人帮助家乡的亲戚朋友到此地谋生，有些人只身孤影、无依无靠，只能干苦力活。

兴化新客初到新加坡，需要亲友的帮助和保护，自然集中在一起，分别在奎因街（Queen Street）、阿拉伯街（Arab Street）、万山街（Ban San Street）、梧槽坊（Rochor Canal）、明古莲（Bencoolen Street）及布连拾那街（Pinsep Street）。新客同租一间房，称为估俚间：车主兼房东的家，里面住着很多人，只有木制床位，且非常简陋、昏暗。人力车夫就是在这样恶劣环境中生活，干着被人视为低贱的拉车工作。至于人力车夫悲惨的生涯，中国作家老舍的著作《骆驼祥子》是典型的例子。

詹姆斯·沃伦（James Warren）在20世纪80年代曾撰写一本《人力车苦力：一部新加坡人民的历史》*Rickshaw Coolie: a People history of Singapore (1880-1940)*，该书分成两部分：其一是详述苦力南来的情况、人力车的发展、殖民政府对人力车的政策；其二是陈述人力车夫的生活。人力车夫长期被四害，即肺病、梅毒（花柳）、鸦片和营养不良，导致他们一生活在穷苦、债务和病痛之中。人力车夫多数是单身汉南来谋生，既没有家庭，又无处消遣，很容易被吸引到烟馆抽鸦片和赌馆赌博，吃不饱导致营养不良，加上长时间筋疲力尽，所有的车夫四、五十岁就衰老逝世。

福清人在20世纪初期南来谋生，因多数目不识丁，家境贫穷，寄居在开车仔馆的乡亲家里，为了温饱，只好跟着乡亲学拉车。根据口述历史馆黄家莺（Ng Kar Eng）所述：“福清人租人力车的地方在后马车路（奥菲亚路 Ophir Road）、惹兰勿刹（Jalan Besar）的干榜加卜（Kampong Kapor）、大坡桥南路（Soth Bridge Road）。”^[8]福清人多数居住在维多

利亚街、奎因街、柔佛路（Johore Road）、麻坡路（Muar Road）、安哥里亚路（Angullia Road）。福清的车夫，累积资金购置人力车成为车仔馆的车主，当福清新客来到新加坡，便吸引新客加入这行业。^[9]

高长古是李光耀家族的人力车夫，1934年他从福清南来新加坡谋生。后来被蔡认娘聘为接送李光耀和弟妹上、下学的车夫。^[10]蔡认娘借钱给他开杂货店，他又帮李家开辟菜园。蔡认娘是高长古的恩人，他生病时蔡认娘照顾他。李祥耀回忆说道：“高长古是一位很强壮的男子，因他可以拉着人力车奔跑。”^[11]另外，他在大检证时，救李光耀逃过一劫。李光耀被宪兵要求站一边，感到不妙，于是灵机一动要求宪兵让他回去拿衣物。他与高长古逃到惹兰勿刹茂德路（Maude Road）75号估俚间躲起来，一天半以后再出去检证就过关了。高长古竭力保护蔡认娘的子女，深得蔡认娘的信任。

人力车是靠出卖劳力维生，生活不仅艰苦，还得面临警察的勒索及剥削，因而爆发罢工事件。1897年1月8日下午6时发生第一次人力车大罢工，持续四天。缘由是人力车工友与车主不满警察用粗暴的态度对待工友，以及一些贪官污吏勒索敲诈工友和车主。罢工期间，维多利亚路



人力车与三轮车在牛车水（图源：国家档案馆）



位于尼路的人力车局（图源：国家档案馆）

和美芝路（Beach Road）曾发生骚乱，警察将车夫打得口吐鲜血，扣押116人。不仅人力车绝迹，连马车也消失，因马车车主和车夫担心人力车工友误会其出来搞破坏。^[12]

尽管环境对人力车不利，但兴化人和福清人在人力车行业依然占多数。兴化人、福清帮的车主联合人力车工友于1901年10月21日向英国殖民政府发起罢工事件，因不满执法人员过于严厉，引起人力车主和工友的不满。^[13]接二连三发生罢工事件，凸显下层阶级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人力车夫依然在强权底下求生存。

三轮车日治登场、战后崛起

据莫美颜《日治时期人力车夫佩带的徽章》一文所述：“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人力车仍然可在马路川行。日军政府为了方便管辖，还规定所有人力车夫都得佩带徽章。这枚圆形的徽章，除了编号，还印了“人力车和昭南缩写的昭字等日本文字。”^[14]

三轮车也是短程的代步工具之一，在日治时期引进到新加坡。车首用脚踏车在侧边安装座位或货框组成三轮车。战后三轮车崛起，人力车进一步减少，仅有1670辆。人力车载客，实在有损人的尊严，因此殖民地政府有意淘汰人力车。1946年8月新加坡市议员提出废除人力车动议，并获得通过，限令人力车于1947

年4月30日停止在公路上使用，自此人力车走入历史。

由于人力车的消失，许多人力车夫转而踏三轮车，黄家莺亦是其中一名，他买了一辆二手的三轮车开始载客。^[15]三轮车的数量激增至8948辆，聚集在市区街边、巴刹、医院、诊所等地。体弱多病者会坐三轮车到附近的医院；家庭主妇、帮佣和小贩到菜市场买菜搬货时，也会坐三轮车；有些三轮车还会兼当校车，接送孩子上学。

三轮车工友联合会于战后在明古连街成立，当市政局要实施手牌法令时，其提出反对意见，赴华民政务司请愿。实施征收手牌费，反而造成公务员舞弊，加重工友负担。^[16]后来与市政局举行圆桌会议，市议员叶平玉以徽章代替手牌征询工友的意见，工友代表表示徽章由工会给予工友，且手续费减低，但另一位议员反对，谈判无法达成一致。^[17]三轮车工友联合会原本打算于9月1日实行罢业，再派代表呈函总督重申请求豁免领取手牌。^[18]9月12日，三轮车工友联合会接受代总督的意见，手牌改为徽章，并派代表到车务局谈商领取徽章手续。^[19]

1948年10月16日，车辆注册局开始强制三轮车每年必须接受2次的检验。届时，三轮车有1600辆，持有执照车夫有1350名。1950年三轮车有6825辆。20世纪60年代德士的增加，使得三轮车的数量进一步下滑。1962年三轮车仅有3629辆。^[20]

林有福时代，对三轮车的管制更严格：车夫考执照不容易及格，检查车辆时难过关，要求三轮车经常修理以保安全，车身改为绿色。三轮车收费以路程计算，每半英里或未及半英里为两角；也可以按时间收费，每小时\$1.50，每增加15分钟收费四角。70年代，搭一趟三轮车需要三至五角。新加坡河的红灯码头一带有很多三轮车停靠，因为中午时分可载上班族去午餐。

1983年4月8日，车辆注册局决定废除三轮车的检查制度。因三轮车行驶缓慢，不会对其他公路使用者造成威胁；加上车辆注册局从密驼路（Middle Road）搬迁至新民通道，三轮车夫需要花2个多小时来回市区与车辆局，接受5分钟的检查，耗时耗力。有关当局接获不少投诉，最终决定废除三轮车的检查制度。^[21]由此可见，三轮车夫一直都在争取维护其权益。



三轮车夫在惹兰勿剎（图源：国家档案馆）

三轮车成为观光和小贩用车

1990年代，三轮车变成观光用途，一些游客及年长者乘坐三轮车游览市区以了解新加坡的历史及各街道特色。许多城市都有观光三轮车，新加坡也不例外。2010年起，方耀明经营“三轮车大叔”（Trishaw Uncle），提供三轮车观光服务。三轮车大叔车队停靠在白沙浮一带雅柏中心旁的三轮车站（Albert Mall Trishaw Park），游览景点包括小印度、牛车水和甘榜格南（Kampung Glam）等地。2023年5月，三轮车大叔与旅游局的合约到期，并停止服务。^[22]

三轮车也成为流动的冰淇淋小贩用车，在乌节路（Orchard Road）义安城到ION商场的街道、四马路观音庙往森林大厦的交叉路口尚可看到其踪影。迄今，三轮车冰淇淋小贩已经减少，有的把脚踏车换成摩托车，后座撑起遮阳伞，售卖各式各样冰淇淋。

题图说明：当年的人力车夫（图源：国家档案馆）



注释：

- [1] 邵家宁，〈大学生拉黄包车〉，《联合晚报》，1990年9月21日，页21。
- [2] 柳团利（Lu Tian Lee），档案号：000669/8，页54。
- [3] 黄家莺（Ng Kar Eng），档案号：000117/3，页25。
- [4] 梁山，〈人力车——新加坡怀旧〉，《星洲日报》，1976年10月12日，页12。
- [5] James Warren, *Rickshaw Coolie: a People history of Singapore (1880-1940)*, Singapore: NUS Press, 2003, p.83.
- [6] 麦冬，〈人力驱车消长〉《南洋商报》，1983年1月11日，页31。
- [7] 南洋大学东南亚华人史课程师生编纂，〈兴化人与交通行业〉《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族行业史调查研究报告》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4，页34。
- [8] 黄家莺，档案号：000117/5，页45。
- [9] 区如柏，〈福清人与交通行业〉，《联合早报》，1988年3月13日，页36。
- [10] 高长古（Koh Teong Koo），档案号：000136/4，页1。
- [11] 张丽萍，〈如果不是这个人救了李光耀，新加坡历史将永远改写〉，《红蚂蚁》，<https://www.redants.sg/good-reads/story20190325-2582>
- [12] 《叻报》，1897年1月9日。
- [13] 韩山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力车风潮此起彼落〉，《联合早报》，1996年9月21日，页47。
- [14] 莫美颜，〈日治时期人力车夫佩带的徽章〉，《联合早报》，1991年8月11日，页38。
- [15] 黄家莺，档案号：000117/5，页46。
- [16] 《南洋商报》，1947年6月3日，页5。

- [17] 《南洋商报》，1947年7月18日，页5。
- [18] 《南洋商报》，1947年9月1日，页5。
- [19] 《南洋商报》，1947年9月12日，页5。
- [20] 韩山元，〈三轮车50年来的兴衰〉，《联合早报》，1996年9月25日，页36。
- [21] 莫洁彬〈三轮车夫大喜讯！三轮车不必再受检查〉，《联合晚报》，1983年4月8日，页11。
- [22] 《联合早报》，2018年3月21日。

参考文献：

- [1] James Warren, *Rickshaw Coolie: a People history of Singapore (1880-1940)*, Singapore: NUS Press, 2003.
- [2] 叻报（1897）。
- [3] 郑桂妹（Tay Quay Muay），档案号：00739/1-3。
- [4] 南洋大学东南亚华人史课程师生编纂，《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族行业史调查研究报告》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4。
- [5] 南洋商报（1947，1983）。
- [6] 柳团利（Lu Tian Lee），档案号：000669/1-16。
- [7] 星洲日报（1976）。
- [8] 高长古（Koh Teong Koo），档案号：000136/1-6。
- [9] 黄家莺（Ng Kar Eng），档案号：000117/1-9。
- [10] 联合早报（1990-1996）。
- [11] 联合晚报（1983）。

（作者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博士、文史工作者）

当文青遇上了愤青



文图·郭振羽

七同姻缘

今天是作者罗伊菲第13部著作《伊菲心语（续）：踏歌人间斜阳好》的新书发布会，我很荣幸被邀请担任第一位发言人。我自认很有资格，就当仁不让接受这个任务，因为在座各位之中，我认识作者时间最久；从18岁到现在算算已经66年了。我们结婚60年，今年是我们钻石婚纪念，也算是一个双庆的年份。

我们60年前在夏威夷结婚，在夏威夷州政府注册，有案可查。谈到我们的生日就有点乱了。我出生时父母亲是以农历日子登记。伊菲出生是以阳历登记。伊菲的母亲在台湾她进小学的时候把月份和日期对调，结果了从9月7日变成7月9日，可以早一年入学。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身

分证上日期都对不上。

在座不少朋友都知道我们两人同年同月同日生；订婚时因为是同班，又是研究所同学，中央通讯社同事，发布新闻标题说是“七同姻缘”，传为佳话。我心中想同年同月同日出生有这么难吗？就学时髦，去请教我的人工智能AI老师。我的问题是：在50个人（同班同学）之中有两人同一天生日的概率有多少？果然在五秒钟就得到答案：是3%。看来确实是相当的难；更难的是这3%还要一男一女，还要对上了眼，结为夫妇，确实少见。概率如何，AI也算不出来，只好说是缘分了。

新认识的朋友听说了我们的故事，都表示好奇，半信半疑。伊菲总是很有耐心跟朋友说明这段个故事。我就乖乖的坐在一旁第N次洗耳恭听，感觉上好像是学生作弊，创造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欺骗小女生的心。——若是如此也算是成功了。

事实上，朋友看到我们两个人，一个白发苍苍，一个明眸皓齿，感觉上明明是老夫少妻，偏偏要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说来也是，当年我常到中国开会，人家以为是一位老教授带了个学生助理，好像很合理；或者是一位老院长带了一位小秘陪同，同样的相当可信。所以小秘伊菲的座位，往往开头坐在后排，然后慢慢往前移，最后坐在这个老教授的旁边。

文青与愤青的结合

我们当年的结婚是一个文青和一个愤青的结合。大家都知道伊菲性格温柔体贴，人缘又好；我的脾气不好，路见不平，总要出头打抱不平，惹下不大不小的麻烦，常要伊菲出来打圆场。我们结婚60年好像没有吵过架，都是伊菲让的



新书《伊菲心语（续）：踏歌人间斜阳好》封面

多。我说脾气好的人不吵架没什么了不起；脾气坏的人，才要靠修养。

回想结婚60年，到底吵过架吗？而且为什么吵架？结果想起了一段往事：都怪金庸。

应该是1970年代的事，我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读得很辛苦。那年借到一套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两人看了都放不下来，抢来要看。最后两个人讲好要安排时间轮流看。那天，伊菲不守信用，霸着书不放。我等待多时，愈等愈不耐烦，生气“此人不守信用”，一气之下，飞毛腿一脚踢掉她手上的书，吓到了三岁的儿子，跑过去把书捡起来，还给妈妈说：“妈妈看书，妈妈看书”。这个没出息的妈妈，接过书来，关起厕所，继续和黄蓉约会。不怪别人，确实要怪金庸！

难得糊涂

伊菲年轻时候迷糊是有名的，结婚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改得更精明一点。记得我拿到博士学位后刚开始到威斯康辛州立大学教书，就在明尼苏达老家邻州，开车不到两小时。周末常会携儿带女开车回到明州和老朋友聚餐、聊天打桥牌。晚上尽兴后开车回到威州新家，才发现伊菲把皮包留在明州了。伊菲很开心说，那我们下个礼拜又可以去明州把皮包拿回来。

那几年我常到夏威夷出差，伊菲偶尔也带小孩前来度假。有一年到檀香山机场出关时发现行李箱钥匙不见了，无法验关。弄了半天，海关人员只有放弃，看这位旅客无助的样子，好心的挥挥手说，“算了，还是快去找个锁匠打开算了。”伊菲开心地回答说：“谢谢，谢谢。我还记得那个地方！”

又有一次，伊菲带了女儿去看电影。看完后开心回到停车场，发现有部车子没有关引擎。她很同情地说，“是哪个糊涂虫忘了关引擎啦！”，结果那个糊涂虫就是她自己。

我们结婚60年，这跨越世纪60年的变化有多大呢？我只能说，当年结婚时，我们相互承诺，结婚之后一同学习，一同成长，一同过日子，一同老去。结果60年过去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只是60年来伊菲不守信用，留住青春，拒绝老去。我找不到当年在台北校园里面，我大衣口袋中那只冰冷的小手了。这只小手，经过60年的淬炼，处理过大小风浪。面对



同年同月同日生84岁生日，以及结婚60周年（钻石婚）共庆

危机两人携手，一一化解。多年来，儿女进出医院，自己进出医院，老人进出医院。这双手不再冰凉，已经是一双坚强坚韧，是撑得起考验带领一家人度过难关的双手。这60年的风风雨雨是四只手一起撑起来的。

当然，还有变与不变。60年过去了，我发现：文青老了，风采依旧；愤青老了，脾气都没了。

自我完善的追求

伊菲这本自传续篇是她过去33年的纪录，轴心主题是她的音乐活动。

我们两个人小时候都没有接受过什么正式音乐训练。没学过钢琴，也不会小提琴，只是喜欢古典音乐，有共同的喜好。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或说是“半约会”，就在大学一年级的圣诞节去听弥赛亚。那时候两个人约会时机还未成熟，所以我又拉了一位好朋友，当电灯泡。三个人一起去听一场音乐会，所以说是一个半约会。

伊菲年轻时家教很严，少唱歌。我们两个人的小家庭，大人不吵架，也不打骂小孩。她从来嗓子不大，教她声乐的黎列刚老师应该最有体会。他指导伊菲多时，伊菲老是放不开嗓子。他忍不住问她，“难道没有打骂过小孩吗？”

“没有。”

“夫妻没有吵过架？”

“没有。”

而伊菲这位没有受过正规音乐训练的人，就在33年前建立了合唱团，开始学声乐，以33年的岁月努力推广音乐。她自己在2000年以60“高龄”勇敢步上维多利亚音乐厅，独唱意大利歌曲Caro Mio Ban，以及中国艺术歌曲《枫桥夜泊》，算是一鸣惊人。

我在她的音乐活动中，只能努力做个支持的角色。我陪同合唱团远征布拉格，也到了伊斯坦布尔，还去了上海、杭州、台北。我这顾问角色实际上只能帮忙提行李，拿外套。最精彩的一次是在乌节路边的圣诞演出。我的责任是帮忙他们看管皮包。我很尽责，没丢掉一个包包；倒是有不少路人甲、路人乙跑过来要打卡合照，让我觉得很荣幸。

当然更精彩的是2024年，她和她的一批年轻朋友花了一年排练，在“华族文化中心”演出两场原创华语音乐剧。我们高龄84岁的“伊菲姐”上台载歌载舞，非常成功。

她一再以身作则，展现学声乐的好处；保持身体健康，脑筋清晰；交了这么多年轻的朋友，让她的日子过得非常精彩愉快。孩子们都说妈妈变了。

让我以儿子澄的序言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年过50的妈妈，终于完成自我完善的追求，让我们刮目相看，原来母亲有这么丰富的情怀，这么多故事想分享，这么多乐曲想讴歌。一位二十余年来一切以丈夫、孩子为主的（尚自认“现代”）的女性，在半百之年，始“出落”为一个全人。（郭子澄序“此心安处”）

这本自传讲的是伊菲的故事，这个在烽火中出生湖南边城的女娃，终于达到自我的完成。这不但是个人历程的见证，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作者为本地资深学者。本文根据2024年12月8日《伊菲心语（续）：踏歌人间斜阳好》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



文图·李国樑

上世纪60年代初期，自治邦政府着手在全岛多个地区兴建组屋，以解决日益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经过40年的大规模开发，多个新镇应运而生，八成本地居民住进政府组屋。随着时间推移，新镇逐渐成为成熟市镇或老化。近年来，政府重点翻新这些老区，并建设了一些新楼。

继开发榜鹅20多年后，建屋发展局在登加（Tengah）展开另一个新镇项目。这个位于西部的本地第24个市镇，与蔡厝港、裕廊和武吉巴督相邻，面积相当于碧山。全面落成后，将提供3万个组屋单位和1万多个私人住宅单位。2023年8月，新镇的田园区迎来首批组屋居民。趁着登加新镇正处发展阶段，让我们一同见证其蜕变之路。

历史与发展的脉络

登加新镇的命名虽沿用“旧”登加的名称，但其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有所不同。从前的甘榜登加位于距离新镇中心约两公里的旧蔡厝港路旁，毗邻蔡厝港犹太人坟场，对面是登加空军基地。

新镇的前身是充满乡土气息的山芭、砖厂和橡胶园，80年代政府逐步征用该地区，废弃的土地被划为军事训练区。与裕廊路平行的泛岛快速公路将原地分隔为今日的登加和裕廊两部分。

登加以“森林市镇”为设计理念，规划成五个分区：田园区（Plantation District）、绿园区（Garden District）、园林区（Park District）、碧兰区（Brickland District）和山景区（Forest Hill District）。从前这里称为“山顶”，从“坡底”（市区）回山顶的路，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登加的转变，是乡村走向城市化的生动写照：

1. 裕廊路10条石：现为武吉巴督西8道，是昔日回家必经之路。曾有黄梨园村、甘榜乌鲁班丹和育明中学，居住在甘榜乌鲁班丹的多数是马来人和爪哇移民。

2. 裕廊路11条石：现为田园区，是登加新镇首批开发的分区。曾有五美砖厂、甘榜双溪裕



廊、圣约

翰堂等，居住

在甘榜双溪裕廊的多数

是马来人和海人。裕廊路南面

是如今的裕廊东32街一带，曾有培德学校和星洲砖厂。

3. 裕廊路12条石：现为绿苑区和山景区，绿苑区是继田园区之后开发的分区。曾有建丰橡胶园、南洋砖厂、丰加村、丰加徙置区、醒南学校、孺廊学校和裕廊中学等。裕廊路南面是如今的裕廊西，曾有甘榜乌鲁裕廊和裕廊砖厂。前裕廊初级学院坐落在裕廊砖厂原址，居住在甘榜乌鲁裕廊的主要是鱼虾养殖户。

4. 园林区和碧兰区：园林区是登加的镇中心，从前是西武吉知马山。园林区衔接碧兰区，有百年海印古寺，以及消失的南山村和亚洲砖厂。

5. 山景区：覆盖面积最广，5公里森林走廊为喜欢大自然的居民提供辽阔的绿色出行空间。曾有武林村华人聚落和华人坟场。

裕廊创新区毗邻山景区，与一个甲子前开发的裕廊工业区，共同反映从传统工业迈向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历程。谷歌率先入驻创新区，并在这十多年间陆续增建至四座数据中心。根据谷歌的说法，新加坡拥有东南亚最广泛的海底电缆网络、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透明的商业法规以及充满活力的互联网经济，成为谷歌在本地设立东南亚最密集数据中心的首要考量。

裕廊创新区的另一亮点是2023年开幕的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创新中心，生产电动汽车所应用

的高科技包括

智慧型机器人、制造

业神经网络、虚拟实景和无人操

控技术等，整间工厂的运作只需百余名员工。

人性化、科技化的规划与建筑

相比于从前的新镇，登加的整体规划显得人性化得多：首批居民入住田园区不久，巴士转换站已投入使用；预计在未来两年内，4个裕廊区域线地铁站也将陆续开放；五层楼的综合邻里中心已投入运营，内设超市、食阁和超过70家零售店面；年轻夫妇关注孩子的成长，如今学前教育也已启用；预计2030年左右，登加将建设结合传统医疗和社区护理功能的综合医院。

田园区的设计最别致之处是仿古的社区农道，灵感来自过去的乡间小路。居民可以当个现代农夫，在自家门前种植蔬菜水果，享用亲手栽种的成果，或在周末市场销售农产品。设计师也将过去村民用罗厘运输瓜果的概念，融入到以农家为主题的儿童游乐场。昔日农村光景无法倒流，或许现代化的“田园”生活能够激发我们对未来城市甘榜的构思。

砖块曾是传统房屋建材的主要选择，如今已被钢筋混凝土所取代。昔日裕廊的砖厂集中在裕廊路11条石和12条石，开采原料多依赖人工挖掘，烧窑过程则使用大量木柴，导致空气严重污染。随着环境部加大监管力度，大型砖厂投资自

动化及环保设备，小型经营者因资金不足而被淘汰。本世纪初，本地已完全停止生产砖块，转而制造混凝土预制模版。

建筑行业因工作辛苦，生产效率低且安全风险高，导致年轻人望而却步。一些外国建筑团队引入现代科技，例如：日本使用机器人进行拆装作业和远程人工智能监控危险区域，并通过建筑信息模型（BIM）改善协作与决策，大幅提升工作效率与安全性。

由于本地建筑业长期依赖外劳，建屋发展局决定与现代科技供应商联手推动行业转型，减少对人工的需求，一些创新技术正在登加新镇试行。譬如：大林组引入日本的做法，以智能起重机和全球定位系统来进行高空作业；本地承包商则在新预购组屋项目中使用机器人进行抹灰和油漆。这些试点计划或许能为未来的建筑业奠定基础。

登加空军基地

旧登加的老住户——登加空军基地于1939年正式启用。按照计划，几年后，巴耶利峇机场将关闭，林厝港路一带约8万个华人和穆斯林墓

地及民间农场将被征用，为登加军事基地的扩建让路。

登加空军基地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二战期间的马来亚战役，日军在哥打巴鲁成功登陆后，迅速派轰炸机空袭新加坡，登加基地成为重点轰炸目标。日军入侵新加坡时，登加也是其占领的第一个机场。马来亚紧急状态期间，英军轰炸机从登加基地起飞，打击马共在原始森林中的据点。新马合并时期，英军更在此部署战斗机以应对印度尼西亚的威胁。随着英军全面撤离，登加空军基地移交给新加坡共和国空军，并在国防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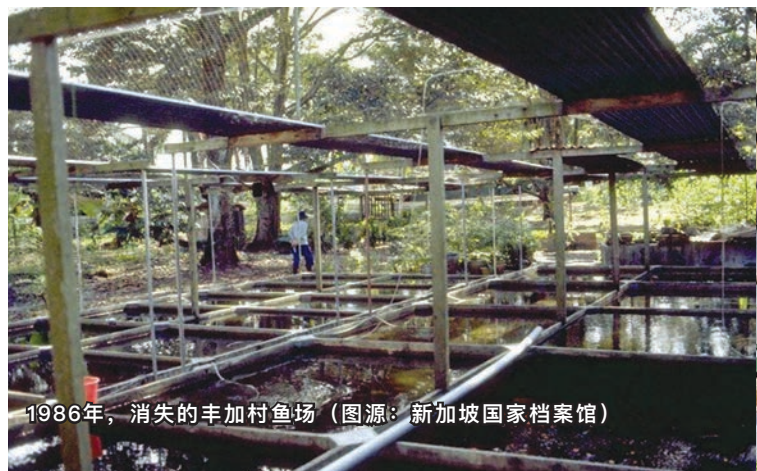
军事训练存在着一定风险，以1978年农历新年前几天发生的一起事故为例：从美国采购的二手天鹰式战机在飞行过程中失控，坠向丰加村的农舍。幸运的是，当时年轻的农妇因接电话离开现场，两名飞行员也及时弹射逃生，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多年来，空军多管齐下，持续提升飞行安全，例如采用先进的飞行模拟器进行训练、优化测试程序、改进飞机性能，并与合作伙伴携手提升安全意识，从而有效降低了训练风险。



消失的公立醒南学校（图源：醒南学校校友提供）



圣约翰堂曾坐落在裕廊路11条石奉教山上，丰加（奉教）村因此而得名（图源：Diocese of Singapore YouTube 截图）



1936年，消失的丰加村鱼场（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从“奉教”到“丰加”

现代登加最著名的老地方当数“奉教村”，1960年代才更名为福建话音似的“丰加村”。早在19世纪下半叶，圣安德烈传教会的牧师和圣安德烈学校校长便联手在裕廊开展教会活动。种植园主人张丰盛（Teo Hong Seng）捐赠三英亩地来建造圣约翰堂，让他的家人和农场员工参加礼拜活动，丰加可能因村民信奉基督教而得名。1990年教会迁至花拉路圣玛格烈女校（中学）现址，遗留在原教堂山坡上的20余座坟墓将于近期清理，其中包括张丰盛之墓。

辛羽在从前的“登加新镇”成长，他在《瞬间·侧影》书中描述老家：“在胶园深处，是介于裕廊路和蔡厝港路之间的大片青绿的山村。从村子走出最近的街场，也得在胶林里穿行半个多时辰，裕廊河悄声地蜿蜒流过……所谓街场，不过是一条双车道的柏油路旁，紧挨着两排相面对的店屋……那家叫‘联安’的咖啡店是小街场的中心，方圆几公里的村民们一早聚集在这里，一杯咖啡，一份咖椰烤面包加半生熟鸡蛋，一个大包，一份报纸就是一个上午。”

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许多乡村被改造成市

镇，也有荒芜之地开辟为新村，丰加徙置区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片土地原为橡胶园，因橡胶树无法产出胶汁而被废弃。新加坡独立翌年，政府将这片土地分配给因各类发展计划而受影响的居民，其中包括因马林百列填海而被迫搬迁的渔民。从打鱼转而务农村民，为原来的丰加村注入人气。晨雾笼罩下远山含笑，田间有人辛勤耕作，也有人踏着脚车出大路，搭乘厂车到裕廊工业区上班，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到了80年代，丰加村民迁移到附近的新镇。裕廊西1道一带以丰加命名，延续这片土地的历史记忆。

开办学校 有教无类

二战前，圣约翰堂在教区内开办学校，学费分成三种标准：每个月5角、3角和免费，学校的常经费由圣公会教区华文议部、校董会及社会贤达捐助。此外，圣安德烈学校也通过举办游艺会为乡村学校筹款。

民办的孺廊、醒南和培德学校原址位于现今的登加新镇。新加坡自治邦总理李光耀下乡访问时，承诺为裕廊工农子弟兴建中学。1963年



设计师将过去农家记忆融入到田园区的儿童游乐场



过去村民用罗厘运输瓜果的时光无法倒流，相关记忆或许能够激发我们对未来城市甘榜的美好想象



正在兴建的绿苑区，屋子和地铁沿线同步进行



地铁将乘客载入登加民众俱乐部

和1966年，裕廊中学和育明中学相继开课。1980年教育制度改革后，育明中学成为全国唯一的纯华文源流政府中学；孺廊小学，也发展成为本区域最受家长追捧的优秀学校。

未来几年，武吉知马的英华学校（小学）将迁至登加新校舍，并转型为男女混合学校。百多年前卫理公会在厦门街创办这所学校，后来搬迁至皇家山麓（现为国家档案馆），所秉持的是服务大众的初衷。如今英华学校决定来到新镇落户，预期将以教会学校一贯的优质教育惠及更多居民。

五年后的登加新镇，不仅将成为本地公共市镇的重要坐标，还将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愿景。届时期待在登加与大家相会，再一同回味它的成长。

参考文献：

- [1] 黄友平，《新加坡地名探索》，八方文化（2020），ISBN 978-981-1219-78-8.
- [2] 黄玉云，“谈裕廊话砖厂”，《联合早报》1988年1月10日。
- [3] 张佳莹，“登加预购组屋项目采用多项先进建筑科技提高生产力”，《联合早报》2024年10月24日。
- [4] Ng Keng Gene, Graves in former St John's Church cemetery to be exhumed to build homes in Tengah, The Straits Times, 9 October 2024.
- [5] St John's Chapel 120th Anniversary Newsletter.
- [6] The Straits Times.

题图说明：

首批居民入住田园区不久，巴士转换站已投入使用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Where Forest Meets Modernity: The Transformation Story of Tengah New Town

In the early 1960s, the HDB launched a five-year housing development plan to address Singapore's housing shortage. This initiative resul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lats across the island, giving rise to new towns that housed 80%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by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While some towns have matured into established communities, others have been rejuvenated with new developments to infuse vitality.

Over 20 years after Punggol's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engah town, Singapore's 24th and newest Housing Board town, was initiated in the West region of the island. Adjacent to Choa Chu Kang, Jurong and Bukit Batok, Tengah spans an area comparable to Bishan and will eventually host 30,000 units of public housing and more than 10,000 units of private housing. In August 2023, the first batch of residents moved into the Plantation District, bringing new life to this area.

Despite the name of the "old" Tengah remaining in use, the new town has a distinct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history. Previously, Kampong Tengah was a small village along Old Choa Chu Kang Road and opposite the Tengah Air Base.

In 1939, Tengah Air Base officially commenced operations, becoming Singapore's second airbase after Seletar Airport.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plan, Paya Lebar Airport is to be closed within a few years, and approximately 80,000 Chinese and Muslim graves, along with local farms around Lim Chu Kang Road, will be cleared to make way for the expansion of Tengah Air Base.

Tengah Air Base has held significant strategic importance throughout its history. During World War II's Malayan Campaign, after Japanese forces landed successfully at Kota Bharu, they launched air raids on Singapore, with Tengah Air Base becoming a primary target. When the Japanese invaded Singapore, Tengah Air Base was also the first airfield they captured.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British bombers took off from Tengah Air Base to strike at communist insurgent strongholds hidden in the dense forests. Thereafter, during the Indonesia-Malaysia Confrontation, fighter jets were stationed at Tengah Air Base to counter potential threats from Indonesia.

Tengah new town was once home to rural settlements, rubber plantations and brick factories along Jurong Road. The Pan-Island Expressway, running parallel to Jurong Road, divides the land into modern Tengah and Jurong.

Designed as Singapore's first Forest Town, Tengah is divided into five districts: Plantation, Garden, Park, Brickland, and Forest Hill. Thi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combines urban planning with sustainability, transforming rural landscapes into contemporary communities.

Tengah's human-centric design stands out due to its integrated amen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Shortly after residents moved into the Plantation District, a bus terminal has begun operations. By 2027, four stations along the Jurong Region Line are expected to open. An integrated neighbourhood centre with supermarkets, eateries, and retail shops is already in use, while a new integrated general and community hospital is slated for completion by the 2030s.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Plantation District is its community Plantation Farmway, encouraging residents to engage in urban farming. Families can grow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sell their products at weekend markets. Designers have also incorporated historical elements, such as a farm-themed playground inspired by the past practice of transporting goods by lorries. These elements create a nostalgic yet forward-looking vision of urban living.

Tengah's transformation is deeply rooted in Singapore's histor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St. Andrew's Mission pastors and the principal of St. Andrew's School conducted church activities in Jurong. Plantation owner Teo Hong Seng donated land to build St. John's Chapel so as to provide a venue for worship services for his family and workers, hence the name "Hong Kah" of the region. After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abandoned rubber plantations in Hong Kah were repurposed as settlements for displaced residents, including fishermen affected by reclamation projects in Marine Parade.

These settlers brought new life to the area, transforming it into a flourishing community. By the 1980s, residents have relocated to nearby new towns. Jurong West Avenue 1 has been named "Hong Kah" in commemoration of its heritage. Tengah's development continues this story of transformation, blending tradition with innovation to shape a future-ready town while preserving its historical roots.



从斯坦福到北大元培 探索即兴魅力的新世界



文图 · 郭姵妤

深 秋的北大校园，金色的银杏叶轻盈舞动，营造出一派温暖的氛围。在这样的季节里，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场独特的探索之旅：在元培学院的庭院里，我们的笑声和欢呼在寒风中回荡。这不仅是一周一次的集体欢聚，更是我在北大新开设的一门课程——“即兴的魅力”现场。

北大元培学院的“书院成长课程”以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为宗旨，涵盖德、智、体、美、劳五大模块。学院提供超过40门课程，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是元培书院教育的一大亮点。学生们在与老师沟通后，可以选择开设自己的课程，并将这些课程纳入书院成长课程的学分中。作为

元培学院2020级的本科生，我非常荣幸能借此机会将即兴课程带入学校。

即兴是什么呢？在生活中，每个没经过彩排的对话、事物、情况都考验着人们的临场反应能力，都是一种即兴。即兴课程在应用于戏剧表演之外，更多可以通过各种富有创意的即兴技巧，旨在教授学员自发性、合作、团队建设以及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它还重视培养学员的常识、对现实的关注、勇于尝试（即使是失败）以及领导力等素质。具体说，即兴课程通过各种游戏激发大家的思考，并在老师的引导下，将游戏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参与者对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上即兴课就如同到健身



斯坦福大学即兴课合影

房，“锻炼”我们在软实力、人际关系、创意与创造力等方面的“肌肉”，而长期的接触即兴也能让“肌肉”变得更加发达。

斯坦福的启示：即兴课堂的初体验

我于2022年作为北大国际合作部交换项目学生，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时接触到这门课。对演艺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最初只出于一份好奇而参加了即兴课程，但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门课中获得启发和转变。一学期的学习，让我变得勇敢并愿意接纳错误、更能天马行空地思考、更擅长与他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同时，也感受到自己的领导力有所提升：学会了更好地观察周围的人和事，能在面对未知时作出更佳的决定。



同学们在即兴的魅力课程中“Hooray”

在斯坦福的经历极大地加强了 my 自信。回北大后，我很希望能分享这份收获，让更多人从中受益。起初，我在学校创立了“即兴俱乐部”，每周末带领大家一起玩各种即兴游戏，并在之后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我随后在元培学院2023年“元住民Community”策划大赛中提出了“即兴的魅力”课程设想，并荣幸获得冠军。在老师的指导下，这门课程最终在秋季学期正式开设。

与斯坦福一周三次，一次两小时的课程相比，我在北大开设的“即兴的魅力”课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中西文化差异作出相应的调整。由于时间限制，我只能筛选课程中最精华、最有趣、最有启发性的内容，以便在短时间内让学生领会即兴的精髓。

探索即兴：即兴游戏的智慧

即兴课程中的游戏看似简单，但每个游戏背后都蕴含深刻哲理。

每个即兴都会以一系列小游戏的形式展开。这些游戏的简明规则和逐步升级的节奏考验着参与者临场反应的速度与能力。比如，一名同学在中心发号施令，而指定的人必须立即做出回应。其回应因游戏而异：可以是抢答或某个特定的动作，有时还需要与旁边的同伴协作。即兴游戏与一般游戏不同的是：参与者在游戏中失误时不会

受到惩罚或指责，反而会引发全体的欢呼声“Hooray”，来“庆祝”，鼓励参与者放下对犯错的恐惧，从而更勇敢尝试新事物。

通过每周课的练习，这种勇于尝试和不怕犯错的“肌肉”将获得“锻炼”，从而间接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当然，随着课程的深入，大家逐渐摆脱了初期的羞涩和畏惧，游戏进行得更加流畅，错误也变得更少。

更多时候，即兴游戏并无对错，而更多侧重于参与者当下从游戏中所获得的感受与启发。

以“照相机”游戏为例：同学们配对，一方扮演“相机”；另一方则是其“三脚架”，引导“相机”在盲行中捕捉瞬间。这个游戏强调的是体验过程而非最终成果，鼓励我们用新奇的视角去发现和欣赏周遭世界的微妙之处。这些微妙之处不仅局限于周边的风景，也许是一块形状独特的石头，一块未曾留意老树标志，或是一个之前不太了解的人。这些瞬间的捕捉，完全取决于“三脚架”同学的创意。游戏的重点并非参与者所“拍的照片”，而是不带有着目的体验每个当下，并尝试从他人视角看到事物。

当然，即兴演绎的游戏也是课程的一大部分。这些游戏激发学员通过模拟真实生活场景，深入体验社交的细节。如：在游戏“奥斯卡派对”中，同学们用扑克牌上的数字来进行身份扮演，并在游戏中通过与他人互动中来猜测自己手中的数字身份牌；“公园里的长椅”游戏，则让同学们扮演两个背景截然不同的陌生人在公园长椅相遇及其对话。这些游戏让同学们能在一个安全环境中实验大胆的行为举止，并通过对肢体语言、行动和表达方式的观察和反思，来促进学员在社交场合和人际关系处理中的敏感度与能力。

生活即舞台：即兴的魅力与启发

一学期的即兴课程落下帷幕后，同学们的反馈也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有同学在游戏中体会到，当放下过度思考，仅凭直觉行动时，反应更为迅速，应对更为得体。也有同学分享即兴课程如何帮助他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学会接受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即兴，不再过度考虑而敢于采取行动。另一些同学则发现，在即兴中尝试和犯错的过程，其实



即兴的魅力课程中“相机”游戏



即兴的魅力课程中“公园的长椅”游戏

是一种学习和自我发现的过程。

对于我而言，即兴课程给予我的最大收获，可能是在于帮助学员建立起积极开放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境，他们学会了接纳不确定性，勇于探索未知，积极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我万分幸运能在斯坦福大学接触到这门课，希望“即兴的魅力”课程中所收获的启发与感悟都能在学员心中留下深刻印记，伴随着他们走出课堂，以更自信的姿态面对生活的挑战、拥抱未来的无限可能。同时，我也期待不久的将来，这类即兴课也会在新加坡和全球各地蓬勃发展，让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即兴的无限魅力。

题图说明：即兴课程结课合影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



“新厦论坛”话闽南

记第二届“闽南文化在新加坡”



文·胡雪琦
图·厦门公会

2023年6月，新加坡厦门公会主办了第一届“闽南文化在新加坡”国际研讨会，全场500多席一票难求。首次研讨会的成功，给厦门公会极大的鼓舞，第二届“闽南文化在新加坡”以“新厦论坛”形式应运而生，活动得到华族文化中心的大力支持。

活动通过《联合早报》、958城市频道等各种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使更多对闽南文化有兴趣的社会人士闻讯而来。2024年11月30日，新厦论坛吸引了400多位民众。

本次活动的4位讲师各具风采，他们对闽南文化独特且多元的观察，带给我们启迪和思考。

新加坡家喻户晓的梁志强（Jack Neo）导演，对新加坡本土基层文化有深切了解。在影片对白中，他巧妙穿插闽南话，反映现实生活市井百态，影片笑中有泪，总能触动观众的心灵

深处，引起强烈共鸣。梁导的演讲如同他的电影一样接地气。在题为《闽南文化与我的电影》的演讲中，他分享了闽南文化元素对电影创作的影响；讲述二十多年前首部闽南语电影从创作到首映的种种考验和趣事。谈及闽南语词汇的丰富生动时，例举“打”这个动词，在闽南语中因着力道大小，动作姿势不同而有非常多不同的表达。他配合肢体语言的传神演绎，唤醒了与会观众记忆深处的闽南语情结。他还现场带领大家唱《少年肖娶某》等广为传唱的经典闽南语老歌。

加拿大籍的丁荷生（Prof Kenneth Dean）博士，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虽为洋人，却是研究华人民间宗教的国际知名汉学家，一上台就秀了一段流利的闽南语。他曾在闽南各地驻扎，广泛深入地探索闽南宗教文化，其勤勉扎实的学术态度令人佩服。都知道福建人爱拜



梁志强导演的演讲如同他的电影一样接地气



丁荷生教授一上台就秀了一段流利的闽南语



黄友江会长鼓励新加坡人寻根问祖，编绘自己的家族树



陈爱梅博士的演讲参杂着槟城福建话，听起来别具风韵

神，听了丁教授的《闽南万神殿》，才知道福建人的神祇如此之多：从广泽尊王到妈祖，从地方到各区域，闽南独特的神明体系、历史演变和传播经他娓娓道来，犹如展开一幅悠远壮阔的神仙画卷。

《拿督公是谁？谁是拿督公》众人的疑问：包括拿督公的起源、分布、类别等等，来自槟城的陈爱梅 (Assoc Prof Tan Ai Boay) 博士为大家一一解开。陈博士是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副教授兼课程主任。她活泼风趣，语速极快，参杂着槟城福建话，听起来别具风韵。她与研究团队在南洋各地关于拿督公的调查结果，让我们在其演讲中难得一窥，只觉意犹未尽。

黄友江 (Ng Yew Kang) 先生是前新加坡驻厦门总领事，现任新加坡族谱协会会长。他讲述《新厦关系面面观》，鼓励新加坡人寻根问祖，编绘自己的家族树。

问答对话环节由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主持。现场观众争先恐后提问：拿督公和土地公的关系？本地特色的闽南语“吃风”“吃蛇”有何典故？等等。会后，4位讲师被热情的观众包围，

彰显出闽南文化和讲师的魅力及风采。

诚如曾士生顾问所言：在一些新加坡人心目中，闽南话是粗俗的，闽南人是迷信的，闽南文化在新加坡，是有形象问题的。实际上，闽南文化源远流长，经过千锤百炼，克服时代变迁，即接地气，又能与其他文化共存，是可以继续演变进化的文化。厦门公会主办《闽南文化在新加坡》之新厦论坛，希望能抛砖引玉，让各界人士领会传统文化对我国本土文化的贡献，并在尊重他族文化的大前提下，继续弘扬传统文化，灌输优秀的价值观，让传统文化，在我国多元文化社会的演化过程中，继续扮演应该有的角色。

题图说明：

“新厦论坛”主办方负责人林澄利（后排左二）、顾问曾士生（后排左三）、会长汪家裕（后排左四）与四位主讲者及与谈人柯木林（前排中）、司仪黄金月（后排左一）合影

（作者为厦门公会总务）

走过一个半世纪的 新加坡华校教科书



文·李金生

图·新加坡国家文物局

华校教科书是殖民地时代和新加坡建国初年几代华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的流行与社会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不同。

作 为新加坡华族文化遗产的一环，华校教科书是殖民地时代和新加坡建国初年几代华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凡是有上过旧时私塾，或进过新式学堂的华人，对他们读过的蒙学课本或现代教科书的记忆，是有深刻印象的。

早期的儿童启蒙课本 (1819-1894)

在现代学堂出现前，新加坡的华族主要通过各种形态的私塾接受教育。这些附设在住家、店铺、庙宇、会馆或其他简陋建筑物内的私塾，没有固定的课程大纲和目标，也没有规范的教科书，而是由塾师决定教哪些内容，不外乎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传统的童蒙课本，附加一些算数、书法等课程。程度比较高的学生则有机会读到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

现代学校的兴起与晚清教科书 (1894-1911)

新加坡第一所现代学校创始于1899年，是一所女校，称为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1]这所由邱菽园(1874-1941)、林文庆(1869-1957)等社会贤达发起创办的女校，以后发展为英文学府，它的课程包括罗马化的马来文、华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和缝纫等现代学科的教育。跨入20世纪后，作为“中国海外教育一支”的华文学校，^[2]包括养正学堂(今崇正小学)、广肇学堂(今养正小学)、应新学校、端蒙学堂、道南学校、启发学堂(今启发小学)等纷纷创立，这些新式学校的课程与课本，乃遵照清政府的学堂章程所规定的目标和大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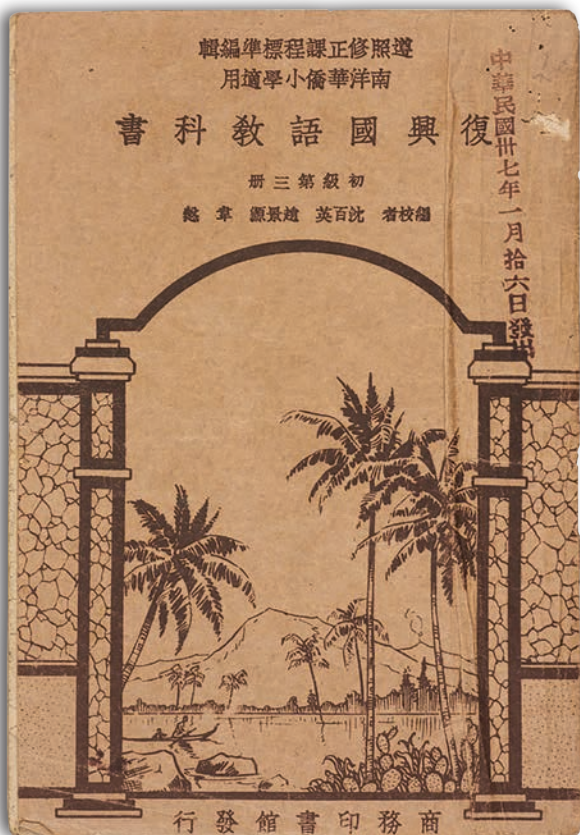
当时这些学校所用的课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编写和出版，包括修身、国文，以及珠算、笔算、历史、地理、伦理、科学、图工、歌唱及体

育等。这些教科书的特色是注重灌输学生若干生活价值准绳，诸如尊孔、忠君、公德心、尚武精神、务实精神等，符合晚清政府对臣民的政治要求。

战前侨校的兴盛与民国教科书 (1912-1941)

1912年，以共和为政体的中华民国成立。从民国元年至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中国面对内忧外患，政治环境极不稳定，主要事件包括五四运动、北洋军阀动乱、国共内战、日本侵略等，这些事件也影响了教育政策和教科书的内容。

这一时期，新加坡华校采用的主要是中国出版社出版、适用于南洋侨校的教科书，其内容自然深受这些政治事件的影响，亦呈现阶段性的特殊面貌。华校采用的一些民国教科书因含反日和反英的内容而屡遭英国殖民政府严查禁用。



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初级第三册，1947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提供）

例如，1928年，殖民地政府已经禁用了一批反英的教科书。金文泰总督（1875-1947）任职期间（1930-1934），对华校教科书审查与禁用，更不手软。在1930年至1935年间，殖民地政府几乎每年都公布一批禁用教科书。仅仅是1935年，政府就公布了16家出版社的84种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为禁书。^[3]

总体而言，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校，在二战以前所使用的教科书，绝大多数都由中国输入，教科书的编纂者均为中国知识分子或教职人员。主要的教科书出版者是创设于中国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它们编写的小学、初中与高中的教科书，包括了国文（国语）、修身、历史、地理、常识、公民、卫生、算术、物理、化学及生物等科，^[4]风行东南亚各地。例如中华书局宋文翰（1894-1971）编写的《中华文选》八册，宋文翰、张文治（1898-1956）编写的《高中国文》，在本地华校多有采用，影响较大。这些教科书的内容，以灌输各种学科新知识和培养中国国民性格为目的，适合中国国内的学生采用。至于专为中国境外的侨校，特别是为东南亚一带侨校学童编纂的“南洋适用教科书”，则多依据以上海为据点的中华版《新课程标准适用课本》及商务版《复兴教科书》系列教科书为蓝本，改编而成，内容和中国国内教科书，大同小异。

这个由中国教科书垄断的局面，直到1936年，由本地华商创办的南洋、众兴、世界、上海等大书局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本土化教科书后，才得以突破。

新加坡版南洋教科书 (1936-1957)

战后初期，华校迅速复兴，但却面对中国教科书短缺问题。1946年至1949年间，中国发生内战，社会动荡，严重影响了东南亚地区华文图书和教科书的供应。为了解决华校教科书的供应问题，^[5]新加坡上海书局组织了一群战时流亡南洋一带、熟悉南洋情况的滞港文人和教育工作者，编纂了一套“南洋化”的上海“现代版”南洋教科书，以解决教科书短缺的燃眉之急。世界书局则出版了“世界版”南洋教科书，南洋书局



南洋书局印行的《南洋常识教科书》，初小第七册，1948年（Sim Siew Gaik捐赠，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提供）

也出版了“南洋版”教科书。

这些内容本土化或南洋化的教科书不仅由本地学校采用，它们也在东南亚其他城市的学校广受欢迎。这些南洋色彩浓厚的教科书，一般称为新加坡版“南洋教科书”。

新加坡世界书局和南洋书局也投入“南洋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一般而言，这些教科书的特色之一，是其内容的本土化色彩较中国版“南洋华侨适用”教科书为浓厚，且较顾及本地的课题。

战后的教育改革与马来亚化教科书 (1951-1964)

战后初期的新马政治环境，与战前截然不同：在殖民地内部，有马来亚共产党的政治诉求、马来民族主义的伸张、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人民开始关注政治，并逐渐投入民族自觉运动；在国际上，中国的政权落入中国共产党之

手、东西方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冷战方兴未艾，华文教育和华校教科书的内容遂从民族教育课题提升到本土政治层面，结果催生了“教科书的马来亚化”运动。

“教科书的马来亚化”，是指英殖民地与过渡期的自治政府为了控制新马方言学校（主要是华校）的发展、推广英文教育而建立的一个新教育制度。其手段是通过改编华校教科书，削弱或删除战前教科书的中国意识教材，引进注重本土化色彩的内容，培养学生效忠居留地的情操。教科书马来亚化的实质，就是政府主导教科书的内容，由政府设立的教科书委员会制定各科课程标准，监控教科书的编纂、审定、出版和采用。^[6]

1951年，马来亚联邦政府邀请中国教育专家方威廉（1903-1993）与联合国官员吴德耀博士（1915-1994）到新马进行调查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并发表了《华校与马来亚华文教育报告书》（又称《方吴报告书》），开启教科书马来亚化的序幕。

1953年，首套马来亚化教科书——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的联营版《国语》问世。此后，截至1956年为止，市面上出现的马来亚化教科书还有上海书局的“现代版”、世界书局的“世界版”、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中商版”、南洋书局的“南洋版”教科书，以及“联营版”。这些版本的教科书也包括语文和数理各科，特点是遵照新加坡、马来西亚政府教育部所拟定的课程标准编纂，内容以兼容华族文化和马来亚文化为中心，教学宗旨以培养效忠本地政治体系为目的。

华校教科书的最后身影 (1965-1979)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初年，在华校就读的学生约17万。当时的华校，除了英文（第二语文）科外，其他科目也主要是用华文教学，华文课本的市场还能吸引五大书局以外的出版社参与竞争，一时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1979年以后，新加坡政府统一四种源流学校，全国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教学后，华文教科书只剩下《华文教材》一种，华校教科书也随着华校的没落走入历史。

注释:

- [1]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John Murray, 1923), 305-306.
- [2] 梁秉赋, 《开智启蒙, 薪尽火传: 从华文教育到华文教学》, 收入康格温、郑昭荣编《华文教育学会7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 新加坡华文教育学会, 2017), 页96-97.
- [3] 郑良树,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 页206.
- [4] 崔贵强, 《从“中国化”走向“马来亚化”——新加坡华文教科书的嬗变(1946-1965)》, 收入叶钟铃、黄佟葆编《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新加坡: 华裔馆, 2005), 页68.
- [5] 陈蒙鹤, 《65年来华文书业在新加坡(1925-1990)》, 收入《源远流长——上海书局65周年纪念刊》(新加坡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 1990), 页70.
- [6] 崔贵强, 《从“中国化”走向“马来亚化”》, 页70.

(作者为文史研究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前馆长)

本文转载自“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欲阅读更多有关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精彩内容, 请扫描以下二维码, 浏览“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



A Century of Textbooks of Chinese-Medium Schools in Singapore (1819-1979)

Textbooks of Chinese-medium schools formed a significant aspect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Chinese who grew up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and Singapore's early nation-building years. Those who attended traditional private schools or new style schools (also known as modern schools, *xinshi xuetang*) continue to hold deep memories of the early learning or modernised textbooks they studied.

Before new style schools were founded, Singapore's Chinese community was primarily educated through private schools. These schools did not have a fixed curriculum or clearly defined objectives. They also did not use standardised textbooks but relied on teachers to decide what to teach. Common teaching content included traditional children's texts like the *Trimetric Classic*, *A Hundred Family Surnames* and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along with arithmetic and calligraphy classes. More advanced student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classics like 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The rise of modern schools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1894-1911) brought about curriculum and textbooks which followed the goals and outlines stipulated in the school charter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hese textbooks were mainly produc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aimed to inculcate various life values in students—such as respect for Confucian values, loyalty to the emperor, and public morality—that aligned with the polit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From the first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 to 1941, major events, includ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mpacted the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content of Chinese textbooks. Singapore's Chinese-medium schools primarily adopted textbooks by publishing companies in China that were designed for overseas Chinese-medium schools in Nanyang. Hence the content of these textbooks was naturally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events in China, and some were scrutinised and banne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for containing anti-Japanese and anti-British content. China's monopoly on textbooks persisted until 1936, when several major bookstores established by local Chinese businessmen began publishing a series of localised textbooks.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local book companies gathered a group of scholars and educators to compile a series of textbooks with a strong local flavour and rich Southeast Asian content which were adopted by local schools and gained popularity in other regional cities.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ultimately led to the 'Malayanisation' of textbooks—shifting from ethnic education to local politics.

After 1979, when schools from the four language streams were integrated into one unified model with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textbooks in Chinese were reduced to only one: the subject-based Chinese Language (*huawen*) textbooks. Textbooks for Chinese-medium schools, along with the decline of Chinese-medium education, eventually became a part of history.

人生闯关：城市书房推出三位年轻作者的**第一本书**



文图·庄永康



在新加坡的华文书局当中，笔者心目中的“最爱书房”，可说是现已立户如切路的**城市书房**了。书局创始人陈婉菁大学毕业后，先在出版社工作，期间到作家英培安开设的草根书室兼职当店员，直至书室易手。后来成立的城市书房，既卖书也兼营出版，显然继承了英先生的遗志。

城市书房前后出版华文作品28种，2022年，书局与作家、讲师黄凯德合作，展开“我的第一本书”计划，向尚未出过书的本地年轻写作者人征选作品。人生闯关，出她们第一本书的，是三名女生：林艺君诗集《新房客》；潘佩冰武侠小说集《路过江湖》；夏元格诗与散文合集《半径》。凯德老师为各书精心设计了封面。

发布会于去年6月2日星期天下午，在南洋艺术学院的演艺厅举行。应邀参与盛况的笔者心中不禁翻起这样的疑问：一、在华人家庭纷纷说英语的今天，到底有谁仍点燃着华文文学写作的热忱？二、在手机即食短讯泛滥的时代，谁还在意阅读，甚至出版实体书？

新华文学记忆的一部分

发布会在主持人黄凯德的穿针引线下流畅进行，尽管大家并没乐观到以为新加坡的文化沙漠形象自此便大为改变，但环顾现场（有图为证），到来参与庆贺这“人生大典”的是汇流自四方八面的年轻人。据出版资料，三位新秀虽然都不是新加坡“土生”，但都有在新加坡“土长”的经验。她们的书写，自然是新加坡华文文学记忆的一部分。

诗集《新房客》作者林艺君，1993年生于

福建龙海，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毕业，目前为《新明日报》记者，作品曾获新加坡金笔奖首奖。在校时曾经旁听过凯德老师的诗歌创作课，一步步走向诗集的出版。笔者凭直观，感觉艺君的诗充满张力。或许凯德在书的序文中说得更清楚：

诗作为一种身体、身份和身世的见证，其实免不了更加挣扎，五内涨缩，血肉撕裂，欲望翻腾，近乎自虐的，在一句未完另一句将起的苦寻之中，想要看清楚自己，还有脚下恒常流动的一片土地……

在本书主题诗《新房客》中，我们便见证了这种五内翻腾的挣扎：

他们反覆检验我贫瘠的出生证
试图从混浊中抓住几个音节
填上新房的住址
却又一笔一画地把我排出体外
河流最急的时候
他们只能拉起即将溺毙的女孩
却不是我
妈妈，言语使人孤独

武侠小说集《路过江湖》作者潘佩冰，198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成长于玻璃市，拉曼大学中文系毕业，目前在新加坡从事电子支付领域。佩冰第一本书，由大马电影导演陈翠梅和《星洲日报·活力副刊》高级编辑陈恂壮为之写序。

翠梅序文的结语是：

武侠小说不一定教会我们任何武功，但是我们学会了侠义、人格、风骨、恩仇。/路过江湖，然后相忘于江湖。



发布会现场，从左至右：潘佩冰、林艺君、夏元格（图源：城市书房）

恸壮是为前班长佩冰撰写序文：

或许你会认为武侠小说嘛，后来者如何写得过金庸、古龙、梁羽生？且放下成见，每一代作者自有独特的风格和定位。

笔者认为，佩冰的武侠小说志在用现代的眼光分析古代（或普世性）的人情物理。如《鬼剃头》中的主人公，是个专业至上，准备破戒行刑，砍下第一百个死囚人头的刽子手。然而，死牢中准备悔改的囚犯，却时时盼望着鬼剃头的出现，让自己得到解救。

读实体书 充满触感

据闻三位作者中最年轻的夏元格，出生于中国而在幼年时便到新加坡来定居。元格生于1995年，南洋理工大学文学硕士，中文系一等荣誉学士，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凯德老师在序文中回忆南大写作班的这位女生：

元格正如元格诗里的那一句：“恍有所悟的靈魂”。

凯德认为，元格的这本《半径》“其实更像是一部时间括弧之内的美学与抒情自传，或者如漫游者穿梭在地质表面和精神深核之间的，一次反复性导览的带路。”

不错，元格的这本夹杂着散文的诗集《半径》，仅120页，体态轻盈，读者实在可以把玩于手中前后反复地作精神漫游。

在网上读过元格的硕士论文，觉得她的左右脑十分均衡，理性与感性俱备。《半径》中的人生之旅，编排得像机场的班机行程看板：

始 00hr 00 min 新加坡 / 转场1 5 hr 15 min
江南 / 转场2 6 hr 15 min 北京 / 转场3 6 hr 25

min 首尔 / 末（后记）。

看来元格每篇诗或文的开头一句，是经营得特别用心的。如：

《始》启程是在无数的安身里过境；

《首映滨海》热带的岛屿之南，有一场璀璨不歇的首映礼；

《搁浅的河畔》十年是四个数字左起第三位的变动；

《转场1》总是习惯在悬空的地点沉睡；

《姑苏一栖》江南是反复书写的诗；

《转场2》短暂停靠的一百二十秒尚且/不足看彻被切割的数块光线；

《京城预告》整个北京城都像是一部费尽心血，重金打造，反复剪辑，等了千年终于上映的电影；

《斗转》赤红的墙未曾/预想过熙攘的游人；

《注意事项》通往站台的楼梯上方/写着“请勿奔跑”；

《末》归途是有我一盏的灯火。

或许，“第一本书”出版的最大意义仍然在于：出的是实体书。佩冰说，她读了心仪的ebook，还是要找那本实体书买下。元格说，看实体书很方便，也很有触感。艺君说，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实体书握在手里，有安全感。

试问：《红楼梦》是因电子版而流传后世的吗？大家今天读的，是不是它的实体书？

套用鲁迅先生讲过的一句话：书在，文艺是不会绝的。

（作者为本地资深报人）

我的诗歌

文·杨雅琦

冰川诞生之际
我的诗歌就已蓦然成型

历史，记忆
随同直觉的血脉
奔流而过

断裂的笔尖野蛮生长
我从不曾喘息
也不曾停下

文字涓涓而流
铺满了我的苍白
谁说这是我的诗歌
我只怕我的血液不够

人世间啊
你又该如何苛责
让千年前的诗篇
如此焦急

林高评语：

第一节激昂而坚信地确立了“我的诗歌”所观照的主题。“冰川诞生”具有象征意义。第二节接得好，把视野推远。“随同直觉的血脉/奔流而过”是佳句。“我”的情感如波澜掀起，不安却坚持下去。“断裂的笔尖野蛮生长”一句值得琢磨。“断裂”“野蛮”与“我”的意愿似乎正好处于对峙的状态，“文字涓涓而流”，结果却是：“铺满了我的苍白”。“我的诗”不应该是这样啊！最后一节质问人世间，源远流长的诗情难道就这样由它荒废吗？



祈愿

文·邱民宗

那晚
夜幕笼罩
海风哀号
刺耳的寂寥取代了
平静的喧嚣
却听见
飞鸟的哀祷

我们的距离
不遥远
却又很遥远

思念在黑夜中蔓延
直到黑夜听见

飞鸟的虔诚
夜幕不再笼罩
海风不再哀号
我们的距离
不再
遥远

附记：

新冠病毒肆虐期间，新柔长堤因新马两国的防疫措施而禁止往返，多少家人好友身处两地隔海相望。

林高评语：

因新冠疫情，新马两地隔离，仅长提之遥，却不得相见。以此为写作题材，甚好。

“海风哀号/刺耳的寂寥取代了/平静的喧嚣”，用矛盾语法很贴切地描摹了思绪的起伏和痛苦。“飞鸟”是虔诚的化身，“飞鸟”期盼能够像过去，自由飞越，这个意象准确。

诗中情绪强烈，却不泛滥。

一家人

文·李享

一

音乐会散场，一家人走出礼堂，父母习惯性掏出手机浏览资讯，直到被清场的工作人员赶走。

“吃什么？”孩子突兀地问。

三人前一天便计划睡个懒觉，起来吃点面包直接去听午间音乐会，然后下一次来之不易的馆子，庆祝家庭日。

父亲仍然是事不关己地沉默。昨晚他便顺从地表示无所谓，把决定权交给母亲与孩子以示尊重，随意到他不像是这家的一员。

母亲仍然是翻找着网上的点评，哪家餐馆都无法满足口味新鲜物美价廉距离又近的要求。

孩子找到一家港式下午茶，试探问起。

太远了。

一家自助餐种类繁多，龙虾螃蟹更是让人垂涎欲滴。

太贵了。

新马风味的家常菜，熟悉的味道找回家的感觉。

太平常了。

下来的问答就是“随便”二字碰碎在大理石地砖上。

于是一家人继续沉默。

二

“走看看吧，去哪里都得从这里出去啊！”父亲终于打破沉默，抬眼看表，三人已经在音乐堂外站了半个小时。

“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要往哪里走？”母亲立刻反驳，“去市中心和回家都不是一个方向——我不走冤枉路。”

“那你站着不是浪费时间吗？走着再说！”

“那你倒是想想吃什么啊，什么都不管，这个家不是你的吧。”

“我都说了吃什么随你便！我参与意见，你说主意不好，我不参与，你又说我不做事……不跟你们耽误，我走我的。”

父亲离开，往来时的地铁站方向走去。

孩子怔了一会儿，拉母亲的手：“走吧。”

她们也往地铁站走，落后父亲片刻。

她们看到父亲下了一层扶梯，那不是通往地铁站的路。母亲不认路，她不常来。孩子认得。

三

母女走在通往地铁站的地下商业通道里，孩子频频看手机。

前面就是地铁站，仍然没有父亲发来的消息。

有脚步声传来，一双大手同时拢住母亲和孩子的肩膀。

“我看下一层有个小演出，哈哈，也没什么意思。”父亲突兀地解释。

孩子也挤出一个笑脸。

于是三人同一时间到了地铁站。

四

“要吃烤鱼吗？坐一站地铁就到，我和妈妈跟朋友吃过的那家。”进了地铁，父母又为往回家的方向还是市中心方向坐车起了争执，孩子再次建议。

“那边餐厅也挺多的。”孩子又补上一句。

“走吧走吧，出来都出来了。”父亲见到一个可能的方向，立刻同意。

好吧。

于是一家人上了地铁。

五

母亲撂下筷子：“太一般了，都吃过一次了，还不如吃别的。”

“还贵。”走出店家，她又忍不住嘟囔。

父亲皱眉：“吃都吃完了，吃饱了不就行了吗？”

六

“大概就是这样，”她向心理咨询师吐出最后几个发涩的字，“我也不明白……”

林高评语：

一家人沟通不良的问题存在于彼此之间，性格上的，现实里的；也可能是埋伏在日常中，日子里缺乏一种凝聚力，家庭生活变得有气没力。活力和生气源自于家庭成员自动自发的付出与完成。李享用冷淡，时而有些敌意的语气叙述一家人找馆子用餐的过程，而存在于其间的心理不满甚至是积累性的。结束颇能收到吃惊的效果——然而，更重要的是，它留下了反思的空间。

乡情似海 岁月如歌

作者·沈芯蕊

蛇舞新岁

乙木生青^[1]
青火通明^[2]
乙巳^[3]
踏歌而来

妙曼舞姿
生生不息
循环往复60载^[4]
婀娜在
时光舞台

灵动的情影
仿佛岁月的精灵
驱走
心灵的烟霾

巳火^[5]
如星洲之星
在滨海湾
点亮
华裔的情怀

乡情似海

宗亲
亲密着血缘
乡情
情牵着地缘
春到河畔
为宗乡打造出
心灵家园

咫尺的乡音
遥远的故土
好似烟花
在眼眸绽放
犹如甘露
洒满
一块块心田

灯火之瑞气蜿蜒
炮竹
报足一甲子的流年^[6]
多元种族
在声波中
共振
华裔血脉
在人海里
汇源

岁月如歌

莱佛士的船帆
划破
岁月长河

贸易的风
悄然吹来
幡动了
心
也动了

纵横的河道
穿梭的船只

编织起
南来的梦想

汗水
汇集成波浪
文化
族群间激荡
新加坡河中
荡漾出峰谷相交的
波场

战火
曾将安宁践踏
黑暗
却未让希望阑珊

殖民
已形成文化的熔炉
移民
铸就出民族的刚强

独立的号角天籁般鸣响
狮城
让雄狮崛起
南洋
任鱼儿游畅

鱼尾狮的隐喻
将各族的梦想
映射成
星洲的月光

岛国炊烟

袅袅炊烟
飘散出
文化的芬芳

咖喱的浓郁
沙嗲的辛辣
鸡饭的温润

使味蕾层次丰富
让舌尖品味多元
饱尝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滋味
让机体健壮
让身心成长
让记忆绵长
让唇齿
留香

文化
是民族的脊梁
华族先辈下南洋
开启
新华文化之滥觞

诗词歌赋
南音的韵律
让生命的乐章
奏响

华族的坚毅
马来的勇敢
印族的灵韵
欧亚的智慧
汇集成
饕餮盛宴
酝酿出
文化的兰生^[7]
在狮城
飘香

狮城华彩

滨海湾的璀璨
鱼尾狮的守望
圣淘沙的浪漫
植物园的芬芳
交织成魅力狮城
谱写出绚丽华章

摩登的高楼
古老的庙宇
淳朴的民风
勾勒出一幕幕
人文风光

白云如诗
在蓝天里吟咏
碧涛似歌
在绿水中欢唱
绿草如毯
在大地上铺张

激情拍打着岁月的堤岸
让岛国灵魂
都因碰撞而尽情绽放
让文化的热浪
托举出赤道炎阳

星洲祈望

疫情肆虐
困惑与希望交响
风云变幻
考验国人的坚强
不畏惧
不退缩
相信团结就是力量
上下一心才能迎来
国泰民康

无论天地玄黄
何惧宇宙洪荒
狮城儿女
总能看到
希望

挑战与机遇并存
无畏行航
在南洋
乘风破浪

于长空
展翅翱翔^[8]
先贤
犹如星洲之星闪烁明亮
历史
好似岁月长河流淌沧桑
星洲
期待人间四月天的美好
狮城
珍惜花朵绽放
鸟儿鸣唱
石叻
愿与女娲共赴苍茫^[9]

补
七彩苍穹
洒
和平曙光
助
岛国富强
愿
百姓瑞祥

采一缕彩霞
拨一片乌云
让世间生灵共沐
和曦春光

注释：

- [1] 天干乙属木，木色为青。
- [2] 乙巳代表覆灯火（出自“六十甲子纳音”）。
- [3] 青火之蛇，喻生命与光明。
- [4] 上一个乙巳年是1965，新加坡建国。
- [5] 地支巳属火。
- [6] “报足”爆竹谐音。
- [7] “兰生”指花酿美酒，喻兰科胡姬。
- [8] 喻新航。
- [9] 传说女娲人首蛇身，喻新加坡为补天石。

(2025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李显龙资政与华社共同喜庆乙巳蛇年 宗乡总会与华族文化中心联办2025年新春团拜



文·苏琳莉
图·编辑部

新 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2025年新春团拜于大年初三（1月31日）上午举行，888位宾客齐聚华族文化中心一同喜庆乙巳蛇年的到来。

今年的新春团拜由国务资政李显龙担任主宾，这也是李资政时隔13年后再次出席宗乡总会的新春团拜。到场的嘉宾还包括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教育部长陈振声，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等多位内阁成员，国会议员，以及外交使节，华社领袖、本地会馆代表、文化艺术团体代表、各族群代表。

主宾国务资政李显龙、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

及华族文化中心主席吴绍均分别上台致辞。李资政回顾了华社在新加坡独立后的60年里，在慈善公益、推广教育、弘扬文化、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努力，为帮助国家建立和谐和繁荣的多元种族社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资政提到今年是宗乡总会成立40周年，总会未来的一大方针，就是在弘扬我国秉持的社会价值观的同时，加强与新移民的联系，协助他们建立对本地社会的认同感。李资政强调，单靠会馆的力量是不够的，国人也必须继续放宽胸怀，帮助新移民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新移民也应入乡随俗，尊重和接受本地的社会规范、文化习俗和价值观，新旧公民才能和睦共处。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新移



主宾李显龙国务资政（前排左七）与嘉宾们围聚一起，互致新年祝福



曾丽恩小朋友代表两个主办方方向李显龙资政送桔子拜年



裕华中学合唱团呈献新年组曲

民也能在这里立足扎根，为多元社会注入活力，为我国独特的华族文化增添色彩。

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在致辞中提到，为进一步支持本地各会馆的发展，总会将与新加坡社科大学合作，为会员量身定制培训课程，旨在提升会馆秘书处和领导层的管理能力，帮助会馆在新时代与时俱进，吸引更多新会员。此外，为鼓励总会继续互助、共享资源并加强活动影响力，总会已将“会馆文化活动资助金”的上限大幅提升到7500元，而单独主办活动的会馆所获得的津贴也将提高到5000元。不仅如此，恰逢宗乡总会成立40周年，总会将于今年下半年举办周年庆暨筹款晚宴，部分的筹集资金将用于大巴窑会所的整修，以更好地服务会员和公众。

华族文化中心主席吴绍均则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心在过去的一年里取得的佳绩。其中包括门票首次销售一空的《SING浪：“SINGAPO人”演唱会》、“新加坡华族文化百科”网站的启动，以及破纪录吸引了4万2217人出席的《中秋合家FUN：“SINGAPO人”一起玩》等旗舰项目。此外，吴绍均也提到，中心的新总裁陈子宇自去年上任后，和董事及中心管理层一起设定中

心接下来三年的四大策略重点，带领中心走向新的高峰。他也宣布中心与陆路交通管理局签署2026至2028年为期三年的协议，在农历新年期间为地铁站、列车和巴士披上新年主题新装。此外，中心也将同国家艺术理事会在今年6月至7月合办第一届传统戏曲节。

活动当天有新加坡福州会馆华乐团带来的吹打乐开场表演，裕华中学合唱团呈献的新年组曲，以及恩隍文化团别出心裁的炫丽舞蛇。此外，更生美术研究会的艺术家们也挥毫泼墨，现场挥春和创作年画赠予嘉宾，为活动营造了浓浓的新春气氛。

题图说明：

李显龙资政（中）、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左一）、宗乡总会名誉会长兼华族文化中心首任主席蔡天宝（右一）、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右二）、华族文化中心主席吴绍均（左二）与恩隍艺术团舞蛇的表演者一起喜庆乙巳蛇年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

春到河畔2025

鞭炮声声贺新岁 祥蛇喜迎SG60



文·叶婷
图·编辑部

鞭

炮声中迎新岁，新加坡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盛事——“春到河畔2025”于1月27日（小除夕）至2月5日（正月初八）隆重举行。这也是该活动连续第五年在滨海湾花园举行，不仅有各类大型灯饰和花卉展览，还有各种游戏与美食摊位，每晚也有不同主题的舞台表演。新春佳节期间，许多公众都和家人一同前来感受欢乐的佳节气氛，热闹满园，访客人数达103万人次。

60串鞭炮喜迎蛇年

“春到河畔2025”延续了去年燃放超长鞭炮的安排，让在场公众感受浓厚的新春氛围。年前的“长命雨”不断，好在开幕仪式当晚天公作美，细雨渐止，60串鞭炮在主宾黄循财总理一记响锣之下响彻云霄。为配合新加坡建国60周年（SG60），“春到河畔2025”在活动和灯饰安排方面都别出心裁，这60串鞭炮便是巧思之一，祝愿新加坡国运昌隆、兴旺发达。难得见到鞭炮齐鸣的热闹场面，现场公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这热闹非凡的时刻，在欢腾的气氛中迎接新春，同时庆祝建国一甲子这个重要里程碑。

总理黄循财在祝愿国人蛇年快乐的同时也指出，建国60周年是个回顾过

去、展望未来的好时机，也意味着新加坡即将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他有信心，只要政府和国人紧密合作，互相信任，就定能在风雨中携手前进。

除了开幕当晚，“春到河畔2025”也在除夕夜和大年初一当晚各燃放30串鞭炮，以最红火的形式喜迎蛇年的到来。

“春到河畔2025”每晚都安排了精彩纷呈的现场表演，海内外演出团体轮番上阵，好戏不断。来自云南红河州蒙自市歌舞剧院旗下的“风从云南来”演出团，以强大的演职阵容和精湛的技艺，为观众呈献一场融合民族特色与欢庆氛围的文化盛宴。除了海外团体，“春到河畔2025”也有许多本地艺人的参与，连续十晚的主题晚会就包括电影之夜、歌台之夜、新谣之夜等等，极具本地文化特色和趣味。夜晚凉风习习，现场观众和台上艺人积极互动，在欢声笑语中共庆新春。精彩多姿的歌舞表演不仅给现场观众带来了许多欢乐，还投屏到园内的大屏幕上，让访客在游园赏灯的同时也能欣赏演出，听出耳油。

璀璨灯饰映新春

恰逢新加坡建国60周年（SG60），“春到河畔2025”作为首批重大庆祝活动之一也推出了相关的主题灯饰。位于擎天树丛（Supertree Grove）的SG60主题灯饰“吉祥年年”巧妙地展现了“狮城”的前世今生，既有我国繁华的都市



黄循财总理（中）主持了“春到河畔2025”亮灯仪式，右为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左为春到河畔工委主席及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

夜景，还融入了桑尼拉乌他玛王子登岛后见到狮子，将此地命名为“狮城”（梵语：Singapura）的传说。这座辉煌的灯饰璀璨夺目，搭配狮子雕像，有着祝愿国家欣欣向荣的美好寓意，引来许多民众合影。

作为每年“春到河畔”必不可少的角色，标志性的财神爷灯饰依旧是众多家庭和游客拍照留念的热点。今年的“包你有钱”财神爷一手指向前方，一手抱着流出金币的硕大包子，喜气洋洋地为访客献上财运亨通的祝福。不少访客也通过照片与财神爷互动，尝试“接住”财神爷的金币，希望来年福气满满、好运连连。

滨海湾花园的花卉展览

来到滨海湾花园，怎么少的了花卉展览？配合蛇年的到来，滨海湾花园在花穹精心设计了以《白蛇传》为主题的花卉展览，将神话故事与美丽花卉相结合。由花卉组合成的“白娘子”最吸引眼球。此外，大丽花作为滨海湾花园农历新年花卉展的标志性花卉也重磅回归，不仅展出超过1000朵大丽花，还展出五个新品种，万紫千红的各式花卉竞相绽放，为春天增添了缤纷色彩。

特别展览——“侨批千里报平安”

除了让访客大饱眼福的灯饰和花卉展览，晚

晴园一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新加坡）与中国福建省档案馆联合举办的“侨批千里报平安”特展也让公众进一步了解到早期先辈的情感与生活。此次展览通过20世纪的侨批，即“下南洋”谋生的华人给中国家眷的书信和汇款，展现了早期华人移民的生活面貌。每逢佳节倍思亲，展览中的侨批，尤其是新年侨批，不仅承载的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饱含着对团圆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春到河畔2025”的线上活动

“春到河畔2025”除了有线下的展览和活动，还有许多线上游戏和挑战，如：新春服装比赛、DIY灯饰比赛等等，鼓励国人动手参与，在传承传统习俗的同时，也为都市生活增添年味。另外，“春到河畔2025”也制作了名为《和》五集小短剧，讲述了一个小男孩在农历新年期间，通过与阿嬷的相处，发现家庭、传统和团聚的重要性，以不同的媒介鼓励年轻人传承传统文化。

“春到河畔2025”已经迈入第39个年头，是我国每年农历新年备受瞩目的标志性文化活动。在这片璀璨灯海中，国人携老带幼，一同游园，无论是灯饰、花卉、表演、美食，还是线上互动，处处都充满着迎春的喜悦，也让每一位参与者在欢声笑语中迎接崭新的一年。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



为迎接蛇年到来，现场融合了很多与“蛇”相关的元素



今年12生肖的主角——蛇



恰逢建国60周年，“春到河畔2025”推出了SG60相关的主题灯饰



“侨批千里报平安”特展让公众了解到早期先辈的情感与生活

宗乡总会奖学金

SFCCA Scholarship

奖学金金额

每学年最多可获得1万5000新元

申请条件

- 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 具有初院学历或其他相等资格的学历
- 已获得本奖学金认可的中国高校录取资格

Value of Scholarship

-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Eligibility

- Singapore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 Possess 'A' Levels or othe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 Admitted into selected Chinese Universities approved by SFCCA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25 – 10.07.2025

咨询 For more Enquiries

☎ 6643 6475

✉ admin@sfcca.sg

🌐 <https://www.sfcca.sg/sfccascholarship>



①今年的“包你有钱”财神爷 ②漂浮在蜻蜓湖面上的“欢乐年年”灯饰，同样以SG60为主题，呈现了象征共同记忆的经典元素
 ③最后两晚是由春到河畔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呈献的“新加坡派” ④云南蒙自市歌舞剧院表演精彩的歌舞
 ⑤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在除夕夜和大家一起喜迎新春（左起依次是：滨海湾花园局长罗志威、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唐振辉部长夫人、唐振辉部长、春到河畔工委委会主席及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人民协会副总执行理事长李忠伟）